

初心与使命

中国共产党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大复兴而奋斗

陈 坚★编著

- ◆ 初心与使命的前提条件：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 ◆ 初心与使命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
- ◆ 初心与使命的必由之路：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初心与使命的接续奋斗：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中国言实出版社

初心与使命

中国共产党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大复兴而奋斗

陈 坚★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陈坚
编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171-2748-2

I . ①中… II . ①陈… III .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IV . ①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2508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张 丽
文字编辑: 秦 璇
责任印制: 佟贵兆
封面设计: 徐 晴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久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3.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ISBN 978-7-5171-2748-2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扛在肩上，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高高飘扬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下“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最早的表述，也是党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初心与使命，并反复强调它的重要意义。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古田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使用了“不忘初心”的提法。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讲话中再次提到“不忘初心”，并充分阐述共产党人的初心的时代内涵。他说：“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里说的“初心”，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党之初所确立的奋斗精神和对人民的赤子情怀。一年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这里不仅在“初心”后面加上了“使命”，而且第一次高度概括了它的内涵，指明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所在、使命所在及奋斗的目标。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奋斗不息的生动写照。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嘉兴的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

党人初心与使命起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并最终执掌政权。这里是党的根脉，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习近平总书记用深刻话语和实际行动，开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之旅，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率。

那么，站在当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初心与使命”呢？应该如何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在要求呢？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步一步地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早在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纲领还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阶级斗争结束、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次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资产阶级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完成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才能创造条件实现党的最高纲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在自己的纲领文件中开宗明义确立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鲜明写下“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些字句。尽管处于初创阶段，但奠定了我们党的前进方向和基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远大理想

和崇高追求，中国共产党才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后又一次次奋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时刻保持“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的斗志，无所畏惧地面对重大挑战、重大风险的考验，勇于担负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翻开历史长卷，不难发现这么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政权的衰落更迭，无不是因为精神懈怠与贪图安逸。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那到底什么是建党时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刊发《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作了回答。他第一次把“红船精神”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第二句是“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第三句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也就是说，“红船精神”充分诠释了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历经磨难不仅不垮而且愈益强盛？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秉承着“红船精神”的初心，始终保持着不懈奋斗的精神状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亿万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前进道路上，党肩负的使命十分艰巨，所面对的困难十分复杂。要战胜这些困难，破除这些障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永葆昂扬进取的奋斗精神，不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立场就是出发点，“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讨论其它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把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站稳人民立场，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早在党的二大党章中，就专门列出关于“纪律”的条文，其中提出党员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机关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还规定，党员如果出现言论行动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和大会决议的、无故连续两次不到会、三个月欠交党费、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泄露党的秘密等情形，必须要开除出党。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对党员也提出非常具体的标准，比如，忠诚、有牺牲精神、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严格规定，都体现了党从严管党治党的基本原则。也正是因为有

了严格的纪律，再加上崇高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才一步一步从小发展到今天这么强大，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才有了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不忘初心”，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三严三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党的优良历史的传承，也是党的建设不断发展的逻辑必然。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遵循这个逻辑，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把严的要求贯彻始终，这样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也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

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奋斗历程，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始终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 | | |
|------------|---------------------------------------|----|
| 第一篇 | 初心与使命的前提条件： 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 |
| | 近代民族危机与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 | 3 |
| |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5 |
| | 掀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 | 10 |
| | 开辟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 | 14 |
| | 抗击外敌入侵与实现民族解放····· | 18 |
| |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新中国的成立····· | 23 |
| 第二篇 | 初心与使命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 | |
| |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 35 |
| |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 43 |
| | 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成就····· | 57 |
| 第三篇 | 初心与使命的必由之路： 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 | 社会主义中国走上改革开放新道路····· | 69 |
| | 实现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伟大飞跃····· | 92 |

跨入全面建设小康的新阶段 104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13

第四篇 初心与使命的接续奋斗：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19

改革永远在路上 144

驰而不息全面从严治党 164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182

第一篇

初心与使命的前提条件： 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时起，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中华民族也逐渐陷入苦难和屈辱的深渊之中。为挽救民族危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出现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的人民英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并没有找到能够改变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正确道路，一次次努力和抗争都失败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自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作为使命，鲜明地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近代民族危机与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绵延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当历史步入19世纪时，中国的农业文明趋于衰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僵化，中国社会的发展也陷于停滞状态。尽管那时中国保持着东方大国的称号，仍堪称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但其实已危机四伏。统治中国的清王朝（1644—1911）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此时，一些欧美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起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为谋取更大的利润，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纷纷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进行疯狂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的中国，自然成了它们觊觎的目标。

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炮舰和鸦片打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大门，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8月，惨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随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先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害。英国割占香港，葡萄牙强占澳门，日本割占台湾。除割地赔款之外，西方殖民主义还取得了在华通商、设厂、传教、驻军、海关、租界、内河航行以及领事裁判等一系列特权，清政府成为众多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工具。

西方列强的入侵给古老中国造成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解体和清王朝衰落的过程因此大大加快，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世纪下半叶，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战争，给予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一批志士仁人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先后发起了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和“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然而，无论是旧式的农民革命还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当20世纪降临之时，中华民族正遭受着空前的耻辱。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了我国首都北京。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但是，勇于抗争、创造过辉煌历史的中国人民绝不甘心忍受这种屈辱生活，他们再次挺身奋战，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1905年，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1911年10月10日，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就此结束，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但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经济上的软弱，这场革命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盘根错节，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战乱不断的苦难深渊中。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1915年9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主旨是反对封建专制、倡导个性解放。随着这一运动的兴起，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不同流派在救国救民方案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论争。

最初，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们的理想仍是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然而，民国初年，中国人尝试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是一次失败的经历。这套照搬西方的东西没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恰逢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矛盾，引起左翼人士的怀疑与批判。中国人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就在这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以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新的希望。他们转而注意俄国的经验，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正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深刻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随之发展壮大。与此同时，随着大批新式学校的开办，学生和教师的人数迅速增加，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远比辛亥革命时期大

得多的且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群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即将到来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积聚了力量，也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准备了阶级基础。

1919年上半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在西方列强操纵下，竟然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反对，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日本。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5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场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运动规模不断扩大，席卷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阶级阶层群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后期，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阶段之后，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阶段。

五四运动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十分有利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场运动中，又有一批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革命知识分子涌现出来，其中不少是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的年轻人。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不仅接受了马列主义，而且决心将之付诸实行。五四运动结束后不久，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分别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因被暗探发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把为人民解放、为民族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由于这次会议是在白色恐怖

下秘密举行的，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中点燃。

延伸阅读 1-1:

高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旗帜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马林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随后拟定了会议日程。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30日晚，在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由于他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的影响和威望，以及他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作的贡献，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的另两位领导人是李达和张国焘，他们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

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

为了民族复兴·英烈颂：

尽善尽美为人民的王尽美

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的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1898年6月14日，王尽美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的一户佃农家庭。1918年春末夏初，20岁的王尽美来到济南。7月，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北园分校。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滚滚洪流奔涌到齐鲁大地，王尽美投身革命浪潮之中，被推选为省立一师北园分校代表，站在斗争前列，领导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1921年春天，王尽美等人发起并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23日，作为济南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到上海、嘉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他与毛泽东、董必武等十几名代表共商建党伟业，在惊险与激情中，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会后，他把自己的名字取“尽善尽美”之意，由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并作诗抒怀：“贫富阶级见疆场，尽美尽善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为了追求“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王尽美永不疲倦。1922年1月，他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在济南成立，王尽美任主任，发动和领导山东的工人运动。7月，王尽美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按照党的指示，他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身份，远赴山海关地区，领导开展工人运动。10月，在他直接领导下，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历经9天，取得斗争胜利。紧接着，他作为总同盟罢工指挥部重要成员之一，参加领导秦皇岛、开滦五矿工人总同盟罢工斗争。1923年1月，他领导建立京奉铁路总工会及山海关分会。山海关、秦皇岛、广州、天津、济南、青岛、青州、潍县……王尽美四处往来奔波，为民族振兴、人民觉醒贡献着光与热。

长期的忘我工作和艰苦生活，使王尽美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1925年春节前夕，他因劳累过度吐血晕倒，入院治疗。时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他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临终前，王尽美委托中共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笔录了他口授的遗嘱：“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为党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带着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的憧憬和眷恋，在青岛溘然长逝，终年27岁。

王尽美同志虽然27岁就英年早逝，但是他短暂的一生却是“尽善尽美为人民”的一生。为国尽忠，为民效命，为党牺牲，志向坚定，奋斗不息，是王尽美青春岁月的鲜明写照，他用青春、热血和生命充分诠释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掀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

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政坛极其活跃的时期，有几十甚至近百个政党组织在争奇斗艳。中国共产党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组织。它们之中，究竟谁能经受起历史无情的考验，脱颖而出，取决于谁能正确指出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并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完成这个任务。

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第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由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这次大会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据此提出党在现阶段的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个纲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为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指明了方向。

除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之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其他任何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全新的革命方法，即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方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年轻的共产党员就深入各大工厂、煤矿、码头，组织和领导工人成立工会，为维护自身权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开展罢工活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直至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血腥镇压，全国工人运动被迫暂时转入低潮。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

还必须联合其他社会阶层，建立工人阶级同其他民主进步力量的统一战线。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最有影响的政党，但其组织松懈、斗志衰退、内部矛盾重重。经过慎重考虑，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以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形成新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实际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新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与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成，使国民党重新恢复生气，共产党也迅速取得全国性影响。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宗旨，反映在当时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中“打倒列强，除军阀”。全国的革命力量首先汇聚在广州，随后在广东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并向南方各省扩展。1926年年中，为打倒北洋军阀，实现国家统一，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战争。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国民革命军迅速击溃了军阀的军队，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也日益高涨，并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

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等国民党内的反共首领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4月28日，李大钊和其

他 20 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杀害，英勇就义。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致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宣告失败。

为了民族复兴·英烈颂：

为主义献身的最勇敢的战士李大钊

李大钊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振兴中华。1907 年，他因“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决然考入北洋法政学校，并放弃已获得的“理财致个人之富”的发展机会。

在进入北洋法政学校的第二年即 1908 年，李大钊写了著名的《登楼杂感》诗二首。其一，“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欲白头。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一事无成嗟半老，沈沈梦里度春秋。”其二，“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邱。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依楼。”诗言志，细读其诗，从中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愤之心与挚爱之情。

1913 年法校毕业后，李大钊又决然放弃走仕途，赴日本继续寻找救国之良策。他的目的，如他的同窗好友郁嶷所说，是为了“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郁嶷不能不无比敬佩而赞叹，他“其志远而识阔”。

1918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演讲大会。李大钊作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同期还发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显现出他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他的这些话一直为后人所

传诵，鼓舞着人们为真理而斗争。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李大钊立志站在被压迫的贫弱的劳苦大众一边。让被压迫者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其艰险可想而知……

被捕以后，在生死关头，李大钊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进分子的光荣本色，他坦然地向他深爱的民族和人民，说出了自己人生的选择：“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并称此时自己“惟有直言”，而决无其他任何罪感悔意。李大钊说，自己如果因为“直言”坚持自己的崇高理想，“而重获罪戾，则钊当实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连当时的报纸也登载：“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李大钊毫不犹豫地来殉自己信奉的主义与理想，他想到的早不是自己，他决然要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而把死亡留给自己。

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寻求救国真理之路的杰出英雄人物李大钊，为了坚持与践行自己的崇高理想，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他遇害的噩耗传出后，当时党的机关报《向导》特地发表悼念他的文章，称他是最勇敢的战士。

开辟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

大革命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反动势力和守旧势力联合起来的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并得到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反动派掌握着军队，占据着中心城市，毫不留情地对革命人民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起一党专制的独裁政府。严酷的现实表明，要在一个像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须有新的思考，开辟新的道路。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和朱德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北伐军二万余人在江西省南昌市发动起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阶段。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共在广州和全国其他城市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是，这些起义大都遭到失败，革命力量也因此受到很大损失。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革命已陷入低潮，仿照俄国十月革命，通过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新道路，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到湖南与江西两省交界处的井冈山，在那里创建起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处偏远山区，远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反动派的控制力量薄弱。不久，朱德等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及一些农民武装前来会合。这两支部

队会师后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并运用游击战接连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与此同时，红军在根据地内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农村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积极改善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也因此得到了贫苦农民的理解和支持。井冈山的成功实践，为大革命失败后陷于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各地红军的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树立了榜样。随着全国各地的红军和红色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中国革命开始复苏。

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共产党人取得了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农村工作和政权建设等各方面的初步但十分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在那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找到了如何在中国社会中立足和发展的答案，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就是把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进行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被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走向胜利的。

延伸阅读 1-2:

井冈山革命道路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武装上了井冈山。面对四周白色恐怖和根据地艰苦的生活，一些人对农村红色革命根据地和革命的前途产生了疑问。林彪曾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回信林彪，阐明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一系列道理，初步回答了这些人的疑问。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彻底消除一些人的动摇心理，就必须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做更

大的努力。为此，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井冈山游击战争的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从理论上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新生的工农革命军和根据地是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大会还讨论了发展党组织、深入土地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选举了中共湘赣边界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军队和根据地斗争。这次会议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边界地方党的领导，有力地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后来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给予了深刻启示。

为了民族复兴·英烈颂：

为革命理想而牺牲的方志敏

1924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地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这是方志敏在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内心表白。1935年1月，方志敏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深入国民党统治地区开展革命斗争，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剿”，部队艰苦转战两月余，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围困在怀玉山区。方志敏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冒着雨雪和危险，复入重围，寻找部队，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于1935年1月29日在皖浙赣交界处的怀玉山区被俘。被俘后，国民党士兵以为像方志敏这样的共产党高官，身上必定有很多值钱的财物。但搜遍全身，除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一个铜板都没有。敌兵不相信，一个共产党的“大官”，竟如此穷酸！这也是敌人无

法明白的。方志敏对党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将人生志趣全部融入对革命真理的信仰和追求之中，为了党的事业，甘于清贫，“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正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敌人把方志敏押到台上“示众”，方志敏镇定自若地向成百上千的群众高声演说：“同胞们！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见面。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贪官污吏剥削统治，国将不国，民不聊生。希望你们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努力奋斗！”面对国民党军官的诱降，方志敏则说：“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功名利禄视如粪土。革命者宁可被敌人残杀，绝不投降敌人，要我屈膝投降，休想！”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方志敏还在狱中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作品，其中饱含了他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他坚信，“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抗击外敌入侵与实现民族解放

1931年9月18日，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突然向中国军队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在随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又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

然而，面对外敌的入侵，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没有集中力量进行抗日，反而连续五次发动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的“围剿”。在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以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首先胜利到达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

此时，日本侵略者正加紧向华北扩张，而国民党政府则节节退让，这使得全国的抗日情绪迅速高涨。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广泛联络各种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制订了“逼蒋（介石）抗日”的方针，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5年12月9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北平（即现北京）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学生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和中共的影响下，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敦促蒋介石抗日，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遣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从而为

结束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条件。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新的形势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实行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阶层人士团结在一起，投入抗日洪流之中，形成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局面虽然形成，但在怎样进行抗战的问题上，两党有着不同的主张和指导路线。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动员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只有实行持久的人民战争，才能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而国民党则担心抗战的进行会削弱其一党统治的地位，拒绝实质性改革，企图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这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具有重大影响。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方面付出了重大努力，但由于实力悬殊、战略笨拙以及其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在日军强悍的攻击下还是节节败退。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此后，日军已无力西进，战争双方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退缩到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大后方，对日作战日趋消极。

抗战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当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抵抗失利之后，共产党决定利用自己游击战争的经验来对付日本侵略者。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样，在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战场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

根据地。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侵略军逐渐将主要力量用于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和空前残酷的“扫荡”。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根据地军民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战法，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通过长期的消耗战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当战争行将结束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遍布大江南北，发展到近100万平方公里和近1亿人口。

为了民族复兴·英烈颂：

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

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在慷慨就义之时，留下了对儿子的期盼：“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为动员群众，争取抗战胜利，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积极开展民主政治建设，普遍建立由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阶级组成，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团结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积极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清新的民主气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统一战线这种形式，中共与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抗战人士、广大海外侨胞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向他们宣传中共的主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鼓励和支持他们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斗争，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也因此不断扩大。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同盟国各国的支援。1945年8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和觉醒，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被日本霸占长达50年的中国领土台湾也回归祖国。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断成长壮大，成为决定战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重要力量。

延伸阅读 1-3:

为人民服务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

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泽东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只要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毛泽东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新中国的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共同签署了《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此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国大地一度露出和平的曙光。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企图继续维持其一党独裁的统治，无意进行任何民主改革，不久就背信弃义地撕毁包括《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在内的一系列协定和协议。这预示着一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终究不可避免。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22万人进攻共产党领导的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当时，得到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在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甚至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解决”中共军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解放区军民实行坚决的自卫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并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在城市广泛发动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同民主运动。这些方针政策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经过一年多作战，至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适时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为了民族复兴·英烈颂：

在烈火和热血中永生的叶挺

叶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新四军领导人、军事家。原名为询，字希夷，1896年生，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从小就立下了“强兵富国”的志向。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任大本营警卫团第2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调集重兵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时，叶挺率部与叛军激战，掩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等脱险。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被派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到广州，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任团长。所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部队。北伐战争中，他率部长驱直进，连战皆捷，屡建奇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部被称为“叶挺独立团”，为第4军赢得“铁军”称号。南昌起义时，他担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失败后经香港辗转到达广州，参加领导广州起义，担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在敌军大举反扑的危急时刻，果断下令撤退，保存了部分武装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在抗战中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敌后抗战。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八昼夜，在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入狱长达五年之久。

在这五年时间里，蒋介石不断派人对叶挺进行威逼利诱，许以高官厚禄，企图劝说他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叶挺不为所动，大义凛然地予以

痛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陈诚也以“老同学”之名，先派人馈送奇缺之物，并劝叶挺前往缅甸御敌，遭到了叶挺的婉拒；后从生活上折磨叶挺，日给两餐，且为发霉之苞谷与糙米，但叶挺同志始终不为所屈，常以“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自励。

国民党反动派眼看无计可施，只好继续扣押叶挺，先后将他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这里，叶挺继续与反动派作斗争，并写出了举世闻名的《囚歌》，表达了自己为信仰而赴死的决心：“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在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叶挺。在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了五年零两个月后，叶挺重获自由，他走出牢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毛泽东发电报，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电文中他写道：“我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

党中央随即复电，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叶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奋斗，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在外流亡和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期间，他历尽磨难、一心向党，充分体现了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周恩来曾深情地评价他说：“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

1948年秋季，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从当年9月至次年1月，在5个月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经过这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在长江以北。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22年的国民党统治宣告覆灭。此后，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西南、西北各省进军，解放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国土，残存的国民党集团从此退到台湾。

延伸阅读 1-4:

牢记“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

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党应当保持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郑重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他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

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国民党反动政权既被推翻，筹建新中国的条件便已成熟。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参加这次政协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662人。在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它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具有临时宪法作用。《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新中国在内政、外交、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

延伸阅读 1-5:

毛泽东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的开幕词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致开幕词。毛泽东说道：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

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

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490922 第一版。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从这一天起，北平改称北京）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奴役、剥削、压迫的命运，结束了100多年来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就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与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

第二篇

初心与使命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党所担负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使命的完成。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由此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是形势的主流；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也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的考验。当时，在国内，国民党在大陆的残存势力仍在负隅顽抗，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是个烂摊子，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在国际，由于“冷战”的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政策。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就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治国本领。

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肃清了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其他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与此同时，各级人民政府相继建立，接管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公共机关，镇压了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在一些新解放的农村地区，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使民众深恶痛绝的匪患得到清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和稳定。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长期在农村发展、缺乏城市管理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变化。在接收城市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难题，为重建饱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进入城市以后，中共立即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工作，依靠产业工人，动员工商界人士，很快便使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工矿企业恢复生产。新中国的国营经济，也随着没收官僚资本企业逐步建立起来。人民政府还废除了帝国主义

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当时，在一些新解放的城市，非法买卖银圆、外币的投机活动十分猖獗。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人民政府首先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进行了取缔银圆投机的斗争。随后，又针对不法投机商大量囤积生活必需品、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粮食、棉纱、棉布、煤炭的集中调运，敞开供应市场，同时收紧银根，使投机商因物价回落、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

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先由各解放区分散管理经济的办法，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集中掌管全国财经工作，统一全国财政收入和物资调度，并采取压缩政府编制和节约开支等一系列措施，很快扭转了建国初期政府开支庞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情况。

在上述恢复经济的一系列工作中，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具有重大意义，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敬佩，叹为“奇迹”。新中国成立后仅经过半年左右的努力，各地物价日渐稳定，全国财政收支趋于平衡，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初步改善。

正当中国人民为全面恢复国民经济而奋斗，人民解放军加紧准备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出兵干涉朝鲜半岛局势，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

美国的军事行动不仅严重威胁了新中国的安全，而且在关键时刻打断了中国统一的进程。未满周岁的新中国敢不敢捍卫自己的利益，回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威胁和挑衅，这是个异常严峻的考验。10月8日，当美军越过朝鲜中部的“三八线”后，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最初的两个半月内，经过两次战役，志愿军将美军击退至“三八线”以南。此后，两军又相继进行了互有攻守的三次战役。至1951年年中，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形成僵持，战争由此进入为期两年的“边打边谈”阶段。

在朝鲜战争进行期间，中国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实现了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至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城乡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实现了根本好转。1953年7月，参加朝鲜战争的各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巩固了中国的东北边疆，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延伸阅读 2-1:

不搞特权——毛岸英给表舅父向三立的回信

新中国成立不久，1949年10月24日，毛岸英在给表舅父向三立的回信中说：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

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是由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能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的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意是不成的。我准备写封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而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戚，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的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不会也决不能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

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有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转到组织部办理，但你要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主要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于广大的贫苦大众的一样的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因为此事给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发，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开始工作了吧，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为人民好好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的，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资料来源：《红书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推行土地改革与社会革新。旧中国的土地问题十分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地少人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另一方面是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手

中，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或仅有很少的土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为此作出努力。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土地制度改革。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到1948年秋，拥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获得土地的农民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条件具备了。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指导和规范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这个法令更多地考虑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需要，注意保护富裕农民、工商业者和华侨的利益。至1952年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对于缺少耕地的广大中国农民来说，无偿得到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不仅意味着从此免于遭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同时也意味着摆脱了由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群众在获得经济和政治的解放之后，迸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新中国还进行了各种社会制度改革。建国初期，废除旧的婚姻制度的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旧中国的婚姻制度，以封建夫权为中心，压迫妇女并剥夺其婚姻自由。在这种制度下，家长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一夫多妻盛行，广大人民尤其是妇女深受其害。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其中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部法律的实施，为全国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新的生

活，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迅速采取坚决措施，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社会痼疾。1949年11月，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的决议，全市所有妓院当即被关闭。随后，全国其他各大中小城市也采取同样措施取缔卖淫嫖娼。全国共查封妓院8400余所。一大批被迫卖淫的妇女经过集中学习和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自近代以来，鸦片烟毒在中国土地上肆虐蔓延，严重危害着人民生命和财产。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根据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发出的通令，迅速采取行动，先后收缴毒品折合鸦片近400万两，给制毒贩毒活动以摧毁性打击；同时禁绝鸦片种植，对贩卖、运输、制造烟土毒品者严加查处；对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限期收缴，限令吸毒者到政府部门登记，并定期戒除。

此外，对各种公开的赌博场所一律查封，对聚众赌博和屡教不改者严加打击和惩处，对一般参与赌博者则进行说服教育，从而使在旧社会十分盛行的赌习很快得到扫除，有效地净化了社会环境。

经过近3年的努力，曾经在旧中国绵延不绝的娼、赌、毒等社会病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基本禁绝。广大人民群众为之振奋，社会面貌、社会风尚为之一新。

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当然离不开党不忘初心的誓言。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宣布：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5月21日，又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决定》，指出发展党员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6月上旬，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就整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确保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了政治保证。

延伸阅读 2-2:

开展自我批评

1950年，《学习》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申峰”的自我剖析文章。作者是一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谈这次整风对自己的触动。文章写道：由于我参加革命的动机是抗日，所以，日寇投降以后，认为和平已经到来，革命事业已成功，革命功臣们应该享受一番了。特别在进入张家口以后，看见城市里花花绿绿，高楼大厦、沙发地毯、小汽车、大饭馆、影剧院、女学生等，都吸引人。我想：这些哪种不需要呢？可以说没有一种不需要。抗战七八年，又没有老婆又没钱。要捞到这些，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吗？从那时起，脑子里经常盘算着如何达到这些目的。整天满街上跑，找熟人介绍对象，打听哪个合作社挣钱多，就想法入股，或从利润低的转到高的合作社中去。讲修饰，讲穿戴，买双皮鞋，做身呢子衣服，房子里安上个收音机，买辆漂亮的自行车。每天不是盘算这个，就是盘算那个。又嫌机关伙食坏，经常上饭馆。整日里就混混沌沌，不做工作，使工作陷于停顿状态。通过学习，思想觉悟有了提高，认识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应当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革命干部应是吃苦在先，享福在后，迷惑于眼前的花花绿绿，就想享受，就是因为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关键所在。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共在建国前夕召开的最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为新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按照《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实行“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方针，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由国家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过3年多的恢复和建设，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中共中央经过近两年的酝酿，提出了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其主要内容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法律的形式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步骤是编制和执行1953年至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一五”计划确立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

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到1957年年底，“一五”计划顺利完成。5年内，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88.47亿元，旧中国重工业基础十分落后的局面有了显著改观。重工业主要产品钢、煤、电等产量大幅提高，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械、精密仪表、电子技术等，相继建立起来。这样的建设规模和生产成就，是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无法达到和取得的。

延伸阅读 2-3:

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一五”计划制定及其方针任务^①

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工业化主体任务的重要步骤，也是中国共产党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采取的重大战略。早在1951年春，中央财经委员会即根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部署，着手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7月形成第二稿，即《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以该轮廓草案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要求的基本依据。

1952年八九月间，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主要任务是就五年计划轮廓草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案同苏方交换意见，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斯大林在同周恩来等的会见中，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提出一些原则性建议，并表示苏联愿意对中国的五年计划建设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及提供贷款等方面尽力给予帮助。

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经讨论，中央确定了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等指导思想。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3年初，中财委对五年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同年6月，改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进行第四次编制。尚留在苏联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在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的领导下，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接触，征询意见，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苏联政府对中国的“一五”计划给予高度重视，对中国五年计划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速度，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规模以及具体落实援建项目等进行了具体研究。1953年4月，苏方正式向中方通报了对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经研究后，赞成苏联对我国五年计划提出的建议和设计项目清单，表示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来完成协定文件中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

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规定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确定援建的50个项目，共有141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煤矿、石油炼油企业，重型机器、汽车、拖拉机制造厂、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化工厂、火力发电站等，还有若干国防工业企业。到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又增加了15个援助项目，由此形成我国“一五”时期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

程。这些项目的建设，构成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据测算，这些项目建成后，中国工业的门类和生产能力都将有较大增加和增长，初步改变旧中国遗留下的工业落后面貌及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这表明，“一五”时期苏联的援助对我国工业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

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主持人的八人工作小组，对“一五”计划纲要草案进行第五次编制。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很不齐全，国内资源状况不明，难以掌握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缺乏编制经济建设计划的经验，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只能采取边制定、边执行的办法，不断进行修订、调整、补充，前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终于形成了我国初期工业化建设的蓝图。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五年计划草案。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会议认为，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指导方针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按照上述指导方针，“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五年中将新建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兴工业部门，同时要用现代先进技术扩大和改造原

有的工业部门；要合理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同时要开始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投资总额达 766.4 亿元，折合黄金 7 亿多两。这样巨大的建设投资，是自孙中山提出建国方略以来，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

“一五”计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谨慎从事，反复论证，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大关系问题。

一是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等问题。“一五”计划将国家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 58.2% 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 88.8% 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建设。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为 1 : 7.3。我国重工业相对轻工业来说基础过于薄弱，尽管轻工业的利润高、投资回收快，但是它的发展却受到原料和能源不足的制约，如果把公私企业和手工业加在一起，其生产能力是过剩的。所以加大对重工业投资比例的安排是合理的。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孤立地发展重工业。“一五”计划十分注意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对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银行贸易、文化教育等部门都安排了适当比例的投资，同时十分注意市场的稳定，强调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使国民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二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布局问题。中国工业约有 70% 在沿海，只有 30% 在内地。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状况，造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过大，不利于对全国资源的全面开发和有效利用，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实现共同富裕，也不利于国防战备。为了逐步改变这种状况，“一五”期间国家在内地安排的基本建设占全国投资额的一半左右。在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中，有 53%

分布在内地。其中武汉、太原、西安、包头、兰州先后建立了一批重工业项目，这对改变原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有重要作用。同时，中央要求充分利用东北及上海老工业基地，并继续培养和充分利用这些工业基地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基地创造条件。“一五”计划确定的694个限额以上〔为便于对重大基本建设项目进行管理，国家规定了各类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300万元至1000万元不等）。不论是新建或改扩建，凡一个项目的全部投资大于限额者，为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小于限额者，为限额以下建设单位。“一五”计划期间限额以上建设单位达到921个〕的工业基本建设项目中，有222个放在了东北和沿海城市，合理地利用了这里的工业基础。

三是关于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效益的问题。计划规定的经济建设规模的大小、速度的高低，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与国力相适应，量力而行。但在试编“一五”计划时，由于希望能尽快地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由于经验不足，曾将经济增长的指标定得偏高，后来经过反复测算，作了必要的调整。比如，原来安排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20.4%，后来确定为平均每年递增14.7%。原来安排农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7%，后来确定为平均每年递增4.3%。这些指标，既积极，又比较稳妥，是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同时，党和国家还制定了不少措施和办法，主要靠现有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民增加产出来提高建设的经济效益。

四是关于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问题。中国实现工业化，需要争取外国援助。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我国争取苏联帮助“一五”计划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对中国工业化的起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党提出了国家建设以国内力量为主的指导方针，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一方面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来解决最紧迫的资金问题。在实施“一五”计划的五年

里，国家财政收入中有69.4%来自国营经济上缴的利润，全国各族人民还踊跃认购国家建设公债。来自国外的贷款仅占总收入的2.7%。另一方面，明确在建工业项目中凡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依赖外援。由此，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中的内外关系问题。

五是关于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国家和集体必须保持适当的积累。在“一五”期间，党和国家注意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计划在五年内，就业人数增加422万人，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33%，农村的购买力提高一倍。在“一五”时期，国家建设规模是相当大的，但是积累率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并不过高，五年平均积累率为24.2%，只比1952年提高了2.8%。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全国工人和农民的消费水平都得到较大的提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激发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总的来看，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既借鉴了苏联的建设经验，又结合了中国的具体情况。虽然制定的过程长了一些，但经过多方面的反复论证，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中期发展计划，在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此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借鉴。

在中国实行工业化，离不开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从1953年起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史称“三大改造”。“三大改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合作或合营的方式，把落后、分散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组织起来，形成能够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建立以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为基

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合作化是实现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途径。中国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同时又是脆弱的，经不起天灾人祸。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广互助合作、成立农业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获得土地的农民再次分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解决商品粮供给不足的难题。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展后，对粮食的需求急剧扩大。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这一政策的推行加快了合作化的进程。到1956年年底，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基本完成。与此同时，政府对城镇中分散的个体手工业也实行了合作化政策，由此组织起一大批城镇集体企业。至1956年年底，手工业合作化在全国基本实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原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那时，仍允许私人经营的工商企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改造主要采取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办法。当时设想，改造将是一个持续十几年的过程，资本家私有制将经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由于大部分私营企业规模不大、设备陈旧、经营落后，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又受到原料、市场、资金等多方面限制，经营渐感困难。于是，一些私营工商企业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公私合营的进程。实行合营后，公私双方虽共同经营，但公方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实行当时所说的“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这样，这些企业与国营企业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差别。到1956年，私营工商企业的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形成。在建设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都比较缺

乏的情况下，集中全国的资源 and 力量，迅速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和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建立起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于保证国家安全和维护民族独立，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具有积极作用。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和基本排斥市场的作用，难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此后 30 多年的实践中，其种种弊端逐渐暴露出来。

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已经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作了明确规定。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这三项基本制度也在不断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筹建新中国的时候，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行动还没结束，人民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尚不具备实行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所以，那时采取过渡措施，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代行宪法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逐渐成熟。1953 年 1 月，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于当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为此，同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在选举法制

定和颁布后，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紧张工作，全国各地先后完成了基层、省（市）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选举。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共商国家大事。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几部重要法律，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选举和任命了新的国家领导机构人员。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与作为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共同纲领》相比较，其显著特点，一是明确了国家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任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保证了这一过渡的顺利实施；二是体现出更完备的民主原则。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次大会的召开和宪法的颁布为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统一战线，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统一战线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按照《共同纲领》组建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权特色，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人仅略占多数。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新中国从一开始便不是一党制国家，但中国的多党制又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存在着根本区别，即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各合法政党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它们与共产党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要形式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人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国家采取重大措施或决定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时，中国共产党通常都事先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取得统一认识，然后再形成决策。

1954年，由于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能也有了相应的改变，即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而是作为独立的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当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规定了人民政协的职能及其同人大和政府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泛团结社会各界，进行政治协商，协助国家机关解决各种问题。这就为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或杂居在中国的边疆和西部地区，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左右。在旧中国，统治者历来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制造各民族地位的不平等，利用和挑动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作为维系自己统治的手段。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便明确地把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作为中国革命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同纲领》专设一章阐述民族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同时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

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极其复杂。由于旧中国统治者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各民族之间，主要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同时，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文化水平也很不一致，总体上相当落后，有的地区还处于原始公社末期。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极为慎重的政策，首先着手消除民族隔阂和对立，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并逐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1953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已建立起47个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地区，其中包括1947年建立的相当于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

1954年宪法的颁布，规范了民族自治区域的设立，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宪法同时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此后，在人口较多、聚居地区较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的工作开始加快进行。从1955年10月到1958年年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相继成立，西藏成立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除省级自治区外，还建立了29个自治州、54个自治县（旗）。这一时期，除西藏以外的民族地区，都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方法进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一定改善。

延伸阅读 2-4:

“五四宪法”——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

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反复斟酌、修改，1954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宪法草案。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全国各界共有1.5亿多人参加了讨论，他们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又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9月9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根据全民讨论的意见，对草案作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前的最后一次修改。从1953年1月到1954年9月，历时1年零8个多月的宪法起草工作圆满结束。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下午3时，在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他还郑重指出：宪法草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将成为我国的国家根本法，全体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9月16日下午至18日下午，大会讨论宪法草案和刘少奇所作的宪法草案报告。20日下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表决。出席当天会议的代表1197人，表决结果：投票数1197张，同意1197张。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布这一表决结果时，全场欢腾，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5分钟之久！

9月20日通过的宪法，其内容包括总纲、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和首都等，共计4章106条。这部宪法由于是在1954年诞生的，又被称为“五四宪法”。“五四宪法”明确了新中国政权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性质，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框架，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我国后来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的制定，在中国有宪政历史的 100 多年里，人民第一次行使了制宪权，开创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运动的新的模式，是集古今中外兴国安邦经验的产物，在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有了一部代表自己利益、体现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一个重要的好开端。这部宪法的实行，证明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其基本精神成为支撑国家的法律基石，也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保障。

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成就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新课题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比较注重学习苏联经验。当时，苏联是与中国交往的最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向苏联学习虽然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但历史表明，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在苏联成功的经验也未必都适合于中国。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严重错误后，毛泽东号召全党要独立思考，根据本国的情况办事，不能一切照搬苏联的经验，必须努力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一年4月，毛泽东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篇报告的宗旨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报告在初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新的方针，试图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例如，关于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苏联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了农、轻、重之间的不平衡，今后中国的经济计划应吸取这一教训，重视发展农业，适度发展轻工业，降低军费比重，注重改善人民生活。报告还论述了如何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与此相联系，这一时期，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统一战线工作

中，中共中央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定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又根据东欧发生波匈事件的教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强调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这些重要思想和方针提出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党内和社会上一时间出现了十分活跃的民主气氛。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异常复杂的任务。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少走弯路。在最初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但毕竟是不成熟的，此后还是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失误：一是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1958年，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群众运动，实现“大跃进”，结果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二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导致了频繁的政治运动，并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1966—1976）这样长达10年的内乱。

为了民族复兴·不朽的丰碑：

不带私心搞革命的谷文昌

身为党员干部，只有牢记责任，为党分忧，为民谋利，才能谋出个“百年犹得济苍生”。1950年，谷文昌随解放军南下支队，解放了离台湾最近的闽南海岛东山。

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前，疯狂抓壮丁补充军队，从仅有1.2万余户的东山，抓走4792名青壮年，这些壮丁家属人数众多，遍及全岛。依照两岸当时硝烟对立的情势，这些壮丁家属是不折不扣的“敌伪家属”。

一旦扣上“敌伪”帽子，就是阶级敌人。“壮丁们是被捆绑走的，他们的家属是受害人。”“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对人民负责。”时任东山第一区区委书记的谷文昌，向县委建议：把“敌伪家属”改成“兵灾家属”。东山县委经认真调研并报上级同意后，采纳了这个建议，一律称作“兵灾家属”，并决定对这些家属，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对待，生活困难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两字之差，天地之分。一项德政，十万人心！

旧社会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但压在东山人祖祖辈辈头上的风、沙、旱“三座大山”，还横亘在面前。当时还是县长的谷文昌，在下乡路上碰到一群村民，身穿破衣、手提空篮，一打听，要去乞讨。东山解放都3年了，居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我这个县长，对不住群众呀”“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挖掉东山穷根，必先治服风沙”，东山县第一次党代会上写下决议：“十年内全面实现绿化，根本解决风沙灾害。”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茬接着一茬种。面对困难重重的治理风沙工作，谷文昌对天发誓：“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1955年，谷文昌担任东山第三任县委书记。为了找到合适的海防林种，谷文昌和技术人员翻尽资料，大海寻踪。听说广东电白县成功种活了一种名为木麻黄的树，谷文昌立即派人前去……3年过去，421座山头、3万亩沙滩，尽披绿装，万亩防沙林、水土保持林，在童山、赤地、沙丘上傲然崛起，环护着田园村舍。在东山，“神仙都难治”的风沙，被共产党治服了。

1969年冬，时任省林业厅副厅长的谷文昌，全家下放至闽西北偏远的山区——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下放期间，谷文昌每月准时交纳3元党费，他从没忘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是他的新战场：到生产队当农民，夫妻俩一年拾粪积肥上万斤；守在田里检查虫害，领着技术员日夜试验，终于让所在村子实现村民吃粮不断顿。“谷文

昌，谷满仓”，名字就这么传响。

身为领导干部，少不了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谷文昌担任东山县委书记，工作中干群思想有疙瘩，他从不居高临下，以势压人，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就说建红旗水库时坑内村移民的事，起初群众思想不通。谷文昌带了县、区干部，挨家挨户给群众算效益账，教育群众顾全大局。群众越听心里越亮堂；占一块小地方，建了水库不仅本村受益，还解决沙后、西埔等六七十个村的浇灌问题。他们说，谷书记不为个人利益，是为大家“打算盘”，我们支持。

为了民族复兴·不朽的丰碑：

心里装着全体人民的焦裕禄

焦裕禄，是党的优秀干部，生前担任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带领群众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

1922年，焦裕禄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崮山镇北崮山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因家庭贫寒，幼年只读了几年书。日伪统治时期，被抓劳工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1943年秋，他给地主当长工。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参军到了河南，历任尉氏县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及团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1953年6月，任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6月，任尉氏县县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12月任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1962年12月初，地委组织部同志在和焦裕禄谈话时，明确地告诉他，兰考是个最困难的县，要他在思想上有个充分准备。当时焦裕禄态度十分坚决地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组织上要焦裕禄回去

安置好家再去兰考报到，而焦裕禄却立即到兰考报到去了。他说：“兰考正在严重困难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正盼望党组织派来的人组织他们向困难作斗争。”

焦裕禄到兰考时，兰考县正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为改变兰考面貌，他抽调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带领大家跋涉五千里，查清了全县大小风口84个，逐个进行了编号、绘图，为防灾抗灾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1963年9月，他调查总结群众的抗灾救灾经验，在全县推广“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村的路”。

1964年春天，焦裕禄同志病情恶化，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强调工作忙离不开不去住院。医生开了药方，他嫌药贵不肯买，他继续坚持下乡工作，肝痛发作自行车不能骑，他就推着走。当他躺在病床上时，仍在思考如何撰写改变兰考面貌的文章。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然惦记着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家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盐碱地上麦子长得怎么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急性复发逝世，终年42岁。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人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习近平同志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写尽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为民情怀与英雄本色。焦裕禄虽然在兰考仅工作470多天，但在群众心中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在党员干部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原因、“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

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这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经历了曲折发展的20年。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虽不平稳，在有些方面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但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工业建设方面，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钢铁、石油、原煤、发电量、棉纱、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电子、石油、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的25倍。

为了民族复兴·不朽的丰碑：

铁人精神永放光辉

铁人王进喜及其体现出的铁人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学习的榜样，是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历史使命的精神动力。

1960年，面对国家建设急需石油的燃眉之急，全国各地的几万名职工和3万名转业官兵，来到了大庆，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会战之初，几万人马一下子涌到萨尔图草原，生活和生产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正是在这样的非常条件下，刚到大庆的王进喜就喊出了为革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他带领1205钻井队的几十名硬汉，人拉肩扛卸运钻机，盆端桶提运水抢开钻，只用5天零4小时就打完了大庆会战的第一口油井，创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在打第二口井时，发生了井喷。为了治服井喷，王进喜顾不上腿伤，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井喷被治服了，可他的伤腿已血

肉模糊，泥浆把他的手脚烧起了大泡。王进喜和 1205 队工人人们的英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附近的乡亲们。房东赵大娘看到王队长累不垮、压不倒，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就对住在他家的工人说：“大娘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人，你们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啊！”从此，“王铁人”的名号就叫开了。当时的会战工委敏锐地抓住这个典型，决定树立王进喜为大庆会战的第一个标兵，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为大会战立功”的号召，一时间，一个学铁人做铁人的热潮在油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油田开发建设过程中，铁人精神一直是鼓舞石油职工战胜困难，勇往直前，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巨大精神力量。20 世纪 60 年代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面对“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的恶劣环境，在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大庆人正是依靠铁人精神，取得了会战的伟大胜利，当年 6 月份就实现首车原油外运，到年底生产原油 97 万吨，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经过 3 年半时间，高速度高水平拿下了大油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贫油的面貌。历史雄辩地证明：铁人精神是大庆油田的传家宝。每一次学铁人、做铁人，就意味着大庆油田的大发展，油田建设的新突破。铁人精神是“爱国、创业、拼搏、求实、奉献”精神的典型化、人格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初心与使命而奋斗的行为准则。

在农业生产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化肥、农药、农村用电、农业机械等也有较大增加，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有了不少改进，全国主要粮食品种产量有了较大增长。

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火车第一次通到宁夏、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同时，全国大部分县镇通了公路，沿海港口新增十几万吨深水泊位，远洋航运方面开辟了通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

三条航线。

在教育和卫生方面，初等教育的普及使中国的文盲大幅减少，而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则为国家提供了各方面建设需要的人才；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迅速甩掉了旧中国遗留的“东亚病夫”的帽子。

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为引人瞩目，包括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等。随着向高科技领域迈进，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这些成就的取得，极大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这一时期经历的曲折也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教训，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为了民族复兴·不朽的丰碑：

民族骄傲——“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伟大成就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导弹、核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中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仅用4年时间，1960年中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发的导弹。1964年，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又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用长征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

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从此之后，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研制和发射了各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潜艇水下发射成功，发射多颗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及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两弹一星”不仅为我们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当年，那些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及许多科研工作者，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他们运用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他们所具有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能力。

1999年9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

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些科学家身上所体现出的“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体现，其核心为科技创新精神，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巨大精神力量。

第三篇

初心与使命的必由之路： 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此，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经过党和人民近40年的共同奋斗，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令世界瞩目，中国社会面貌、中国人民面貌、中国共产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之路、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中国走上改革开放新道路

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正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从此，社会主义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和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中国来说，1976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7月和9月，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中国人民为失去值得敬仰和信赖的领袖极度悲伤，更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忧心如焚。此时，“文化大革命”已持续了10年，造成的灾难已经十分明显。“文化大革命”后期，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组成的“四人帮”集团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他们恣意推行极左路线，并蓄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集团的不满和愤恨已难以抑制。1976年4月5日，北京、南京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场自发的悼念活动清楚地显示了人心的向背，预示了“四人帮”集团的末日。当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的心境从大悲转向大喜。

面对长期陷于停滞的国民经济和遭到严重破坏的各项事业，人们此时的共同心愿是加快发展，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抢回被“文化大革命”耽搁的时间。然而，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今后究竟应该怎样走，那时还不明确。一些人认为可以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一些人认为

应该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道路上去；还有一些人认为旧的道路已经走不通，必须开辟新的道路。这些不同的认识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而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一些观点和理论。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讨论哲学问题的文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它针对的是当时仍然盛行的教条主义和对毛泽东的迷信，这种教条和迷信使中国难以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界、新闻界人士都纷纷参与了这场讨论。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积极支持这一讨论。这场大讨论打破了中共党内一度盛行的个人崇拜，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78年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篇讲话是开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指明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随后，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决定对重大历史是非问题进行系统的清理，强调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备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延伸阅读 3-1:

睁眼看世界，打开国门搞开放

“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的考察团。这个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西欧五国考察过程中，谷牧等一行人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

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大家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党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

可以说，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改变了人们的许多观点，也为中国打开国门、实行改革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化

从1979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次调整的目的是改变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调整的重点是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这次调整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意味着中国开始纠正过去那种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做法。在进行经济调整的同时，改革也启动了。政府采取了一些新的经济政策，如在农村，允许农民有一定的自主经营权，发展家庭副业，进行农村集市贸易；对农村集体企业实行低税或免税。在城市，逐步给予国有企业一定的生产自主权。这些措施有效地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的改革成为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经过两年多的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这就为随后展开的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

有利的条件。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政治领域。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的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全面平反；二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关系。大规模的平反工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到1982年年底基本结束。其间，300多万名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54万名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以及一批长期受打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名誉得到恢复，这就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了新的力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也同时展开。1979年1月，中共中央宣布对多年来守法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不再把他们视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其子女也不再采取歧视政策。随后，中共中央又作出一系列解决其他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定。从各类历史问题中解脱出来的总人数超过2000万。全面平反和大范围地调整社会关系，使得中国人能够身心自由、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个《决议》客观评价了毛泽东的一生，将他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指出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决议》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全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动乱。《决议》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初步概括，明确中国共产党已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决议》的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这一《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延伸阅读 3-2:

小康构想

邓小平与日本政治家大平正芳相识较晚，见面次数也不多，但他们之间的一段谈话，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79年12月5日，大平首相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2月6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大平首相一行。会谈中大平问道：“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大平提出这样的问题，从自身经历而言并非偶然。他在东京商科大学（现在的一桥大学经济学部）这个日本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摇篮上过大学，毕业后进入大藏省（现在的财务省）工作了15年，42岁当选众议院议员，50岁出任内阁官房长官，协助池田勇人首相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在国会获得通过。该计划目标是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结果7年内使计划得以实现。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西德和法国，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位，人均收入1970年超过1500美元。邓小平回答大平提问的谈话节录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目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他在谈话中首次提出的小康目标，1981年11月写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82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大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到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后来多次提到与大平关于小康目标的这次谈话。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1988年8月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回顾提出小康目标的过程时说：“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自从1978

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有一分钟没有答复。接着我说，我设想到本世纪末，那时还差20年左右，如果80年代翻一番、90年代翻一番，那么，在250美元的基础上，就可达到800至1000美元。”

大平首相在访问中国半年后的1980年6月12日与世长辞。当天邓小平致电日方表示深切哀悼。两天后的6月14日，邓小平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吊唁大平正芳。同年9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伊东正义时说：“大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会记住他的名字。”

对于大平的提问，邓小平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回答，勾画出了20世纪后20年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设想。这实际上也是他长期深思熟虑的产物。小康目标提出后，世纪伟人的设计思路继续延伸和拓展，进一步构思和谋划21世纪的远景目标，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构想。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他指出：第一步在80年代末翻一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1987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三大根据中国国情和邓小平的设计构思，确定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前50年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这为实现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

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相当严重，全国有2亿多农民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不仅贫困的农民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使得一批“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老干部深受刺激，因为让人民过上富足的日子是他们早年参加革命时就怀抱的理想。面对现实，人们不能不从改革中寻求出路。

自从1958年之后，中国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即人民公社既是农村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又是基层政权组织。在这种体制下，生产队是基本经济核算单位，农民在生产队内实行共同劳动，统一分配，无论种植什么均由公社规定；而人们的收入，无论劳作是否努力，差别都不大。失去了生产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农民，形象地把这种体制比喻成“吃大锅饭”。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受灾农民吃饭成了大问题。为了帮助农民渡过难关，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将集体撂荒的土地借给农民耕种，收获归自己所有。这一措施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不仅战胜了当年的旱灾，而且收获超过正常年景。改革开放初期，受此启发，安徽和全国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尝试一种新办法，就是在坚持土地、农田水利设施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户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或生产任务，并根据劳动成果取得收入。这种办法后来被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具体做法各有不同，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等。农民的大胆尝试首先得到中共安徽、四川等省委领导人的支持，并在这些地区得以推广，并迅速取得增产增收的显著效果。

延伸阅读 3-3:

解决温饱——农村改革

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初形式——家庭承包制起源于安徽，这与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从实际出发、破除左的禁锢的担当精神以及浓浓的为民情怀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包产到户”等生产经营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曾出现过，但由于它突破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禁区，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而遭到严厉批判。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仍对此心存疑虑，担心这样做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

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走马上任后，首先到广阔的农村，看农业，看农民。他下乡调研时，轻车简从，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想到哪就到哪，直接到村到户，随时随地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他认为这样看到的才是真实情况，听到的才是农民群众的心里话。1978年春天，万里一行从定远县城来到该县的卢桥镇附近，看到一位正在路边休息的年轻农民。当时已是3月下旬了，阳和风暖，可是这位农民还穿着一身破旧棉衣。万里走上前去，同他拉起家常来。那时老百姓看不到电视，不认识万里，也没有其他人在场，谈话就很随便。聊了一段生产生活情况之后，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干子！”事后，万里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解放28年了，我们连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他们！”通过调研，他发现安徽作为农业大省，农村问题远比城市问题

严重得多。万里认为，农民吃不饱肚子，生产搞不好，主要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根本原因是党在农村的政策脱离了实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摸清了根底，万里和以他为首的安徽省委便以极大的胆识和勇气，大胆纠“左”，大胆破除旧的条条框框，促成农村改革，支持农村改革，推进农村改革。

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制定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会后发全省各地农村执行。其主要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允许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六条规定”的中心内容是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把贯彻“六条规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省委六条》的产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它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起了启动和开创的作用。

1979年6月初，万里乘车前往凤阳考察。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大包干的情况，并引用了农民歌谣：“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来烧陈草。”万里听后，当即表态：“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陈庭元反映有些人还有顾虑，主要是干部怕犯错误，群众怕政策变。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都不要怕！”“不管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能够增产增收，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农民有利，群众愿意，就要坚持下去。”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来到凤阳县小岗村，挨家挨户看了一遍，看到户户粮满囤，十分高兴，

在场的人告诉他说有人指责小岗村开倒车，他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从1979年起，经过三年试验，结果表明，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有效实现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的结合，实现了农民生产劳动成果与自身利益的紧密结合。这两个结合不仅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而且摒弃了分配中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因此，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到1981年年底，全国90%的农村已普遍采用了这种办法。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正式肯定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从此成为中国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

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行政体制的改革。1983年10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年底完成政社分开工作。原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被废除，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

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结束了农产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从1985年起，除了个别产品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统购派购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国家也放开除了城镇居民口粮、食油以外的农副产品销售价格。与此同时，国家还鼓励和帮助农民进行多种经营，发展非农产业。这些改革措施增强了农民的商品经营意识，密切了农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广大农民在从事传统的农、林、牧、副、渔生产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将剩余劳动力、资金等转向加工业、商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并迅速发展起由集体和个人经营的乡镇企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两项创造

不仅使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而且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建立起新的市场要素。这两项创造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型——从计划转向市场，也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这有赖于大批劳动力不断地从传统的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创造了条件。农村改革的成功，坚定了人们对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的信心，并对其他领域的改革产生了示范效应。

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全面展开

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时间比农村改革稍早一些。但是，与农村经济相比，城市经济体制远为复杂，涉及工业、商业、服务业等，改革的难度和阻力也更大。因此，中共中央没有急于推行全面改革，而是采取局部试点、逐步推进的战略。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改革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弊端，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否认企业的独立性和利益。在这种体制下，企业或属于国家，或属于集体，所有制结构单一。企业的厂长、经理均由国家管理部门委派，代表国家管理企业。企业的一切重要经济活动均由国家计划安排。例如，企业的收入全部上缴国家，支出再由国家划拨；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品种、数量、定价、销售和原料供给等，均由政府管理部门按计划需要确定；企业员工的工资均按全国统一标准发放。

改革的试点工作是从1978年秋季开始的，最初限于四川省的一些国有企业，然后扩大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改革的第一步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扩权后，企业拥有一定的自主计划权、产品销售权、资金使用权、干部任免权等。这就初步改变了企业对政府的从属关系，增强了企业的市场观念，改变了企业只关心国家计划指标的完成，而不关心市场需求、产品销路、盈亏状况的现象。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企业内部的管理体

制问题日益凸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分配中存在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现象。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一些企业参照农村改革的经验，实行责任制和承包制。中共中央对这一改革及时给予肯定。从1982年起，国营和集体企业开始普遍推行经济责任制和劳动合同制。在这一新制度下，企业和职工在完成承包任务后可以取得利润盈余的一部分，因而它受到企业和职工的普遍欢迎，很快产生了积极效果。

针对国有和集体企业管理体制进行的改革，其影响很快超出预想的范围。当时，城市面临着安置大批知识青年回城就业的沉重压力，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的。据统计，1979年，全国城镇待业人员达2000多万。按照传统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将通过行政手段让企业接收这些人员。但如此巨大的就业需求远远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而且企业扩权后政府再不能像以往那样命令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另辟蹊径。1980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一次全国就业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新思路，即放宽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允许待业人员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在这一新思路的指导下，地方政府逐步放宽了对城镇集体和个体经济的限制，并提供便利条件，鼓励和扶持待业人员以各种形式创业和就业。至1980年年底，在城镇不仅出现了最初一批个体工商业者，而且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各种类型的集体企业或由私人创办的企业，这些企业依靠市场生存和发展，不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内。这些新企业的出现，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进一步打破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并改变了中国企业原先的单一所有制结构。

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引向深入。1981年10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党的一项战略决策，绝不是一种权宜之计。1982年12月，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新的宪法中，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作了肯定。随着非公有

制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私营、个体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纲领，提出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奋斗目标是宏伟的，也是振奋人心的。以此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围绕企业、价格和宏观管理三个方面展开。在国营企业的改革方面，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进一步改革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如国务院逐步把确定职工的工资水平和奖金的权力交给企业，颁布了一系列新的规范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等。在价格改革方面，主要是培育和发展市场机制，以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1984年后，国家陆续减少统购、派购品种，对农民和企业超过国家计划所生产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按市场价格销售。此后一段时间，出现了国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过渡性价格形态。随着市场作用的不断增强，计划价格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宏观管理方面，国家逐步下放经济计划的管理权限，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并开始尝试使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经济手段来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

为了民族复兴·不朽的丰碑：

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甘祖昌

甘祖昌1927年参加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头部曾三次负重伤，留下了后遗症。因身体不好，组织上批准他到庐山或者其他地方去休养，但他不愿给组织上增加麻烦，他认为吃了人民的饭，不给人民做

事，心里过不去。经过再三请求，1957年，已经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解放军少将的甘祖昌辞去领导职务，带着全家回到了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今莲花县洋桥乡）沿背大队务农。他跟家里人说，我们这次回来不是回来当官，也不是回来做老爷、做地主，我们是回来种田。回乡29年，甘祖昌和乡亲们一起修起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甘祖昌离职回乡，工资还保留着将军的待遇，这些钱用在集体生产和帮助贫困户的，有据可查的就达8.5万元，几乎占了他回乡29年全部工资的80%，而他对自己却总是省吃俭用。20世纪80年代初，莲花县有关部门曾准备为他在县城安排一套房子，供他休息用，但甘祖昌硬是不答应。他说：“党和国家给我的照顾已经够多了，我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在农村有赤脚医生，看病不是同样很方便吗？”江西省有关部门准备为他配部小车，甘祖昌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参加实际工作不多，根本没有配小车的必要，还是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用在更需要的部门吧。”有人问甘祖昌：你有官不当，有钱不花，有福不享，到底图个啥？甘祖昌的回答是：“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1986年3月28日上午，躺在病床上的甘祖昌交代老伴：“下次领了工资，再买些化肥，送给贫困户。”这成了他最后的心愿。

四、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全面对外开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十分希望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但在“冷战”时代，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难以实现。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逐渐陷入封闭或半封闭状态。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建立起正常

的外交关系，这使得中国领导人可以更全面地观察和认识世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批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已越拉越大。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实行对外开放，汲取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对于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要意义。1978年3月，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重大决策。从此，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之一。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建立经济特区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半年时间的酝酿，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广东、福建两省作为对外开放的试点，允许这两个沿海省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利用其临近香港、澳门、台湾，海外华侨比较多等便利条件，加快经济发展。为此采取的重要措施，是在广东的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这是借鉴世界许多国家兴办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的经验，以特殊政策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埋经验的重大改革尝试。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城市首先建立经济特区。当时，经济特区享有很多内地所没有的优惠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整个经济活动都面向市场，新建企业大都有外商投资，行政和企业管理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深圳、珠海、汕头以及厦门4个经济特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显著成就。以深圳为例，这个原本与香港一河之隔的边陲小镇，经过短短几年时间，便在荒滩野岭上建立起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城市。1983年与1978年相比较，5年内基本建设投资比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总和增加20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财政收入比创办特区前增长

10倍，外汇收入增长2倍。经济特区一方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另一方面对内亦起到示范作用，它为中国走向全面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1984年年初，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对特区的创建和发展给予了明确肯定。

此后，中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1984年春，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由中国北部到南部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呈现由点到面、由沿海向内地滚动发展的态势。1985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决定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随后再开放辽东和胶东半岛。这一决策使开放的区域超越了城市，覆盖了广大农村地区，形成了整体开放的格局。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海南省，使海南岛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2年，又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以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这一系列重大决策，使中国从南到北形成了由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3个沿海开放地区、两个开放半岛构成的辽阔的对外开放带，逐步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开放格局。

在对外开放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对外开放的形式也日益多样，一大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陆续涌现，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步伐，而且大大增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

延伸阅读 3-4:

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

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但由于中国长期施行计划经济，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一时间还转变不过来。

当“经济特区”这一新名词出现时，一些人开始质疑：经济特区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它是不是等于新租界？种种杂音的出现，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和试办特区的城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鉴于这种背景，年已八十高龄的经济特区倡导者邓小平同志决定南下视察：“办特区是我的主张，至于办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他要去给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一个公平的说法。

1984年，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和珠海等经济特区。在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认真地听汇报，自信地看当地的城市建设，并深入渔村、企业、车间进行调查，亲自了解、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整个过程中，他作风严谨，没结束考察绝不轻易下结论，更不长篇大论，只是看，只是听，满意之处，也只是寥寥几个字的评价，且一定是切合实际的评价。考察途中，他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返回时说什么也不肯从原路下山，硬是选择了另外一条陡峭的路。他的解释是“我不走回头路”。这一小插曲，不仅是对建立经济特区政策的肯定，也是对要坚持把改革开放道路走下去的一种暗示。通过视察，邓小平越来越多地发现，深圳、珠海这几年来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让他对办好经济特区充满了信心！正是因为如此，他在珠海和深圳分别留下了公正客观的评价：“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一评价，使得持续了四年之久的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否正确的争论有了旗帜鲜明的结论。特区人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从深圳、珠海等地回来后，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办好经济特区的信心，并开始有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想法。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窗口。在他的建议下，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开放了包括广州和湛江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随后又相继成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等

沿海经济开放区，这就为后来由特区到沿海，由沿海扩大到内地的多层次开放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一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了时代的最强音。邓小平这次南方谈话，是一场思想的大解放运动，大大消除了人们对试办特区的疑虑，为改革开放事业注入新的动力，也为后来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发展多元化经济，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五、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发挥过积极作用，它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缺乏活力、效率低下的缺陷便日益暴露出来。这正是中国决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究竟应当朝哪个方向走？它是以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目标，还是以建立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按照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理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市场经济则属于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不过，经过新中国建立后将近30年的实践，中国领导人已深感不能完全排斥市场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当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时，其指导思想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发挥市场调节和补充的次要作用。概括地说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尽管在这个设想中，计划经济仍是主要的，但毕竟明确地为市场经济留下了一块发展空间，这就使得中国的改革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以往大不相同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直接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能否突破

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思想将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他们提出，中国最终必须放弃计划经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改造成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但是，这种主张一时还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这一方面是受思想和眼界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有实际困难，这就是必须继续维持现有经济体制运转。如果一下子停止旧体制的运转很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的瘫痪，从而引发极大的社会混乱。经济体制转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而当时中国的干部群众和企业职工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不具备这种承受能力——由于中国长期缺乏竞争机制，也没有现代社会的保险和福利制度，而这方面显得格外突出。

由于难以对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战略。这意味着改革不再从城市国有企业入手，而把重点放到非国有部门，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主要依靠它们实现经济增长。这一战略有效突破了体制内改革的瓶颈。由农村改革所造就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解决城市就业而造就的新型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合资、外资企业的发展，以及国营企业实行的初步改革，这一切使市场经济的份额在中国有了很大增长。

改革的实践推动着人们的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发展。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个文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已蕴含着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实现了党在经济理论上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艰难的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造成了相当多的问题，如企业财务状况的日益恶化、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等。人们意识到，要改革这种状况，必须推

行包括国有部门在内的全面改革，实现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然而，在1988年和1989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风波后，那种强调改革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观点又重新流行起来，并在理论界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

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1992年年初，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邓小平南方谈话，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吸收了南方谈话的精神，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随后的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来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进入全面系统的推进阶段。

延伸阅读 3-5:

吹响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邓小平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是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是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对社会主义中国改革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实现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使社会主义中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古老的中国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沿着中国改革开放道路前进，推动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等再上新台阶，人民生活从温饱向总体小康飞跃。同时，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与全面展开

1992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

按照党的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党中央、国务院着手进行相应体制机制改革和系列政策调整，并制定和实施《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党的十四大闭幕后不久的1993年5月，在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下，由各方面人士组成的25人起草小组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决定。江泽民同志就《决定》的框架、主要内容及需要回答的问题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强调起草《决定》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十四大报告精神为指导，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一份纲领性的文件。这些要求为《决定》稿的起草明确了任务，确定了基本方向。

经过长达5个半月的艰苦工作，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共50条，所以又被称作“五十条”。这个《决定》是对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具体化和系统化，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一个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决定》所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里提到的五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决定》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又一个重要文献，它第一次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蓝图。

《决定》公布后不久，1993年12月、1994年1月，国务院分别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财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划分，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原体制中央补助、地方上解以及有关结算事项的处理等内容。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管理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及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以及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等。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是以统一政策、放

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为方向，将外贸进口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逐步降低关税水平等一系列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此外，国务院还推出投资体制改革、计划体制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多项措施。

通过上述系列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加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明显增强，全国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1380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13.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比1992年增加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达到14764亿元，比1992年增长28%。所有这些成就表明，各项改革措施为有效进行宏观调控，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何看待股份制？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经济？如何理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突破。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党的十五大报告无疑是又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坚持和运用，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发展。所有制理论上的新突破，既使全党摆脱了思想束缚，又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理解。可以说，所有制理论上的突破，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延伸阅读 3-6:

开展“三讲”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叶之后，我国的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性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种种新的变动。难得的发展机遇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素质、驾驭复杂局面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在现实中，相当一部分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理论学习，理想信念动摇，政治敏锐性和鉴别能力缺乏，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等现象，如任其发展蔓延，势必破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中央决定在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和领导班子中开展一次以“三讲”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1995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指出：“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是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定要讲政治。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

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同年11月8日，他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同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

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提出：“要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继续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199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中指出：“今明两年要集中一段时间，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要求通过“三讲”教育推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并对这次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基本要求、基本原则、方式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随后，全党范围内的“三讲”活动全面展开，到2000年年底基本结束。

这次“三讲”教育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分级分批进行，具体步骤和方法是：“思想发动，学习提高”“自我剖析，听取意见”“交流思想，

开展批评”“认真整改、巩固成果”；目的是全面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素质，确保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的全面贯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跨世纪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次为期两年的“三讲”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所作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它采用了整风的精神，着重解决了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提高全党干部的政治素质，加强党性修养，端正思想作风，增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具有重大意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人初心的一次成功探索。

二、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与解决贫困地区温饱问题

消灭贫穷是社会主义根本要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大幅度增加了扶贫投入，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经过连续多年的艰苦努力，全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已经明显缓解，没有完全稳定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8000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成就，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扶贫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贫困人口进一步呈现出明显的地缘性特征，集中分布在西南大石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区、秦巴贫困山区以及青藏高寒区等几类地区，而且多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它们的共同的特征是：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态失调，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这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与前一阶段扶贫工作比较，解决这些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难度更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给

贫困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更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贫困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在扩大。

因而，抓紧扶贫开发，尽快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改变经济、文化、社会的落后状态，解决以至彻底消灭贫困，不仅关系到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振兴、市场的开拓、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也关系到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共同富裕以及为全国深化改革创造条件，这是一项具有重大的、深远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伟大事业。

为了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地区差距，1994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部署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要求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7年时间内，基本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个计划是20世纪最后7年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

《计划》指出，到本世纪末，使全国绝大多数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500元以上，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条件，减少返贫人口；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文化、教育、卫生的落后状态，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同时，《计划》提出了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并明确扶贫开发的基本途径和主要形式以及信贷、财税、经济开发方面的优惠政策，每年再增加10亿元以工代赈资金、10亿元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对资金的管理使用、各部门的任务、社会动员、国际合作、组织与领导作出规定。总起来说，《计划》明确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

在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多方共同努力，至2000年年底，国家

“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中国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具体体现在：一是解决了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二是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间，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修建基本农田9915万亩，解决了7725万多人和8398万多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到2000年年底，贫困地区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到95.5%、89%、69%和67.7%。三是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执行期间，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农业增加值增长54%，年均增长7.5%；工业增加值增长99.3%，年均增长12.2%；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近1倍，年均增长12.9%；粮食产量增长12.3%，年均增长1.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48元增加到1337元，年均增长12.8%。四是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较快。贫困地区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办学条件得到改善，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有318个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迅速，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大多数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得到改造或重新建设，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缓解。推广了一大批农业实用技术，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明显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得到改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五是解决了一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沂蒙山区、井冈山山区、大别山区、闽西南地区等革命老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一些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历史上“苦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地区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经过多年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条件明显改善，贫困状况大为缓解。

应该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出台、实施及其完成，对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实现共同富裕，为改革和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等，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三、科教兴国战略与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

“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中国发展战略的首位。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思想，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指导下，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必须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了落实教育战略地位的重大举措。199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动员全党全社会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正式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重申“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的主张。随后不久，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15年直至整个21世纪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1996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科教兴国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为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农业、工业、国防、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提出了依靠科技振兴行业的发展战略。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地（市）、县（市）也制定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县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针。1988年，江苏省率先提出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决定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逐步转换到主要依靠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上来。1996年，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立，各地方相继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或科教兴省（区、市）领导小组，截至1997年6月，全国共有26个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据统计，到1997年年底，全国已有20多个省、200多个城市制定了以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计划。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首要就是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一是把科技工作自觉地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二是通过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三是建立技术创新机制，推动有条件的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或同企业合作，还可以组建科技企业，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使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投入的主体。四是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完善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五是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开展基础性研究，瞄准国家目标和世界前沿，集中力量攻克难关，重点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问题。六是推动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优化教育结构，改革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使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步建立规范有效的多渠道投入体制，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这些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改革措施，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指明了方向。

“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战略提出后，切实加速了国家科技事业和经济的发展。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7年的10多年里，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31.65%。由此可见，我国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意义十分重大。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古老而文明的中华民族再次腾飞，站在世界科技强国之林。

四、“一国两制”构想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

这个构想，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是党中央经过长期酝酿，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早在1955年，党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设想，接着又提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思念之情，宣布了尊重台湾现状，争取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并建议两岸实行通航、通邮、通商，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进行交流。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并可保留军队，等等。此后不久，邓小平把上述方针明确概括为“一国两制”，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上。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后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通过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强占。中国人民一直强烈地期盼能收回这两块领土。但在长期积弱积贫的旧中国，这种愿望无法实现。到20世纪80年代，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时机渐趋成熟。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随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起草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原则，中国政府排除各种阻力，有条不紊地进行香港回归的准备工作。同样本着“一国两制”原则，1987年4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国人大随后起草并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不仅使祖国统一大业迈出重要一步，而且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范例。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时刻。在如期举行的香港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五洲四海，万众瞩目，神州大地，一片欢腾。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人民终于洗雪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

1999年12月20日，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澳门如期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澳门的回归，标志着在中国国土上彻底结束了外国列强的占领。这是旧中国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跨入全面建设小康的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是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改革不仅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也包括文化和社会领域。进入 21 世纪，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小康的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更深层次，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目标，这使得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实现小康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小康社会”这样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概念。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并得到 1987 年党的十三大的正式确认，写入这次大会的报告。“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就是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就是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描绘了蓝图，制定了路线图。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事实上到 1995 年，原定到 2000 年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任务提前五年完成，“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前两步提前实现，人民生活即将实现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从1995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考虑“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怎么走的问题。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考虑到虽然从经济指标上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但实际生活中老百姓的感觉似乎离小康社会水平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因而在制定“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除了强调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外，还特别突出了发展的全面性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强调“要把社会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据此，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单列为一个大部分，作出专门的论述和规定，指出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主要任务是：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生活质量，扩大劳动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加强环境保护。为了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必须在发展社会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实行鼓励储蓄、适度消费的政策；根据社会事业的不同类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具特色的运行机制，实行地方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鼓励和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社会事业发展，多渠道筹措发展资金；注意搞好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

“九五”计划时期，也是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的叠加时期，先后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以及法轮功邪教组织传播歪理邪说。在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政府不为任何困难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成就。至2000年，“九五”计划的主要任务完成或超额完成，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达894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1997年提前3年完成。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达1338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6.5%。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2000年进出口总额达4743亿美元，其中出口2492亿美

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69%和67%；五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894亿美元，比“八五”时期增长79.9%；国家外汇储备2000年年底达到1656亿美元，比1995年年底增加920亿美元。到2000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253元和6280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4.7%和5.7%；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显著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九五”计划的完成，使得我国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标志着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九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为实施“十五”计划、开始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难以实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农村农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农村贫穷

落后的面貌。

其实，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提出“小康社会”概念时，其中就包括了农村建设。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以及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2004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主要指在全面发展农村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的富裕，农村的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建设，主要指在加强农民民主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和农村法制建设，引导农民依法实行自己的民主权利；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主要指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礎上，开展多种形式的、体现农村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四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建设，主要指在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村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期实现农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愿望。这里明确了此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落实党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各方面建设，并在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举措。在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下，新农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从现在来看，党的十六大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总体上经济发展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的新形势下，中央作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基础。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正如前文所说，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至 20 世纪末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千百年来困扰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但是，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在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需要分阶段、长时间的努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正式宣布，当人类社会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新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一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力争比 2000 年翻两

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三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四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依据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社会转型出现的新特征以及国际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出关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的新部署，构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体系。这个目标体系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突出了五个方面：一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速度和效益不平衡的实际问题，提出要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顺应人民政治参与的新期待，强调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为了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状况，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五是保护生态环境，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我们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目标要求，充分考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充分考虑到我们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复杂情况与问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战略安排。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实施情况来看，党的十六大之后的十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顽强拼搏、开拓进取，朝着党确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巨大成就。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同时，这十年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得到实惠更多的时期。对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一些目标有的提前实现，有的如期实现，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就业更加充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等。所有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为十八大之后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民族复兴·不朽的丰碑：

不忘初心、心系群众的廖俊波

政和县位于福建省北部闽浙交界处，境内山地多，地形复杂，交通闭塞，基础薄弱。贫困县、革命老区、经济发展长期全省倒数第一是政

和的标签。

2011年6月，廖俊波提任政和县委书记。当时正值中央支持福建加快发展和省委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期，各项挂钩帮扶政策陆续出台。“当时政和的落后，反映在观念上就是对发展没有信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感觉落后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应该落后。”廖俊波生前在一次采访中曾这样说道。

像政和这样贫困落后的地方怎么突破，怎么找到一条合适的发展路子，廖俊波当时也有个认识的过程。作为县委书记，廖俊波必须带领大家找到一条能够脱颖而出的发展路子，他要让大家看到发展的希望，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就像廖俊波的妻子说的那样，他是一个疯子，领着一群疯子在做事业。廖俊波带领全县干部，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基层调研，同时查阅大量资料，对比分析其他贫困地区的发展经验。调研结束，几百人一起开了三天的经济发展务虚座谈会，发展的思路基本明晰。廖俊波提出了突破“四大经济”的发展口号。根据“四大经济”提出了最重要的节点工程，成立了十三个项目组，然后根据四套班子的特点以及干部的性格、特长分配任务，从十三个项目组开始重点突破。

2012年春节，廖俊波第一次在电视上拜年，带着四套班子一起，他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我们这届班子对政和发展有信心，因为我们有23万支持我们的老百姓；第二句：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一切为了政和的光荣与梦想。这个光荣与梦想其实不是廖俊波提的，是大家自发写出来的。2013年至2015年政和县域经济蝉联全省发展十佳。2015年6月，廖俊波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

曾经有人问他，离开政和之后，希望得到百姓什么样的评价。廖俊波说：“我从来无需考虑，我走了之后，老百姓对我怎样评价，这个评价不是我可以去考虑的，我只要考虑好该为老百姓干什么就可以了。”“我

始终觉得，人还是要有一点信念，虽然这个很容易被人说成唱高调。如果你的信念确实实实就是想为一个地方的百姓干活，确实实实想为更多的人做点事，你所有的工作，你都觉得是值得的。就像，你为你小孩子洗尿布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受吗？不会的，你是快乐的。”

廖俊波用生命给广大党员竖起了标杆。廖俊波是典型，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可以仰望也可以亲近的普通人，一个大多数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学习就可以成为的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继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后，中共中央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理念，它表示世间万物相互协调、有序发展。构建社会和谐，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保证。

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上不少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后，社会结构随之变迁，这时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总体在不断提高，但一些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社会稳定问题十分突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也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当时中国的情况还有其特殊性：一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速度和规模是空前的，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其他国家在发展长过程中陆续遇到的问题，中国短时间内就遇到了；二是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在转轨过程中遇到的体制机制问题比一直在市场经济轨道上发展的国家更复杂；三是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发展的，国际国内因素的联系空前紧密，各国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在这个阶段，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从面临的问题来看，主要在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民主法制不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就业比较困难，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尚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教育、医疗、住房的发展难以满足人们需要，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等。要解决

这一系列问题，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整体设想，实行进一步调整、改革与发展。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上来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里所谓的“统筹兼顾”是指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方面。中共中央认为，在这个时期，要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并把促进社会和谐放在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促进和实现社会和谐。这是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党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而不断深化。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明确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

史上第一个专门关于社会建设的决定，它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及其定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以及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

从整个《决定》的内容来看，它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四是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五是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更加清晰。这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又一个新的认识成果。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我们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党

关于“小康社会”的美好愿景，展示了多年后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但是，要把这一美好图景变为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更需要全面从严治党加以保证。

第四篇

初心与使命的接续奋斗：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在总结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就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实际上就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描述，也表达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大势，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进展和重大成就。

延伸阅读 4-1:

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习近平

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成为一名知青，直到1975年10月离开。他在这里“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

自己的信念”。

地处延川县的梁家河村山壑丛生，并不富裕，几十年前，连吃水都是问题。1973年，习近平领着村里人打了梁家河的第一口吃水井。梁家河村由于山壑地形的缘故，粮食生产受到了诸多限制。面对这样的情形，习近平又带领村民打坝淤地，建成了梁家河村第一个淤地坝。20世纪70年代，地处大山深处的梁家河村交通不便，生活的必需品都要步行到5公里外的文安驿镇购买。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习近平组织村民建立了村里第一个铁业社，自己制造工具，还建起了梁家河村的第一个缝衣社和第一个磨房。听闻四川有沼气池试验成功，年纪轻轻的习近平便远赴四川取经，40天里走了17个县考察，每到一处必下坑查看，每晚还学习讨论，回到梁家河后便建成了陕西省的首个沼气池，梁家河亮起了第一盏沼气灯。

1969年的梁家河，土窑洞又旧又暗，一到夏天就成了跳蚤窝，村民常常一天早晚两顿喝稀的，中午才能吃一顿耐饱饭……但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待了7年，闯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和思想关。7年的插队岁月，磨练了习近平的意志，更平添了了解山区、走向社会、亲近农民的实践阅历。习近平曾在一次自述中提到：“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身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1969年1月，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

“当年乡亲们教我生活、教我干活，使我受益匪浅。”那时，习近平以一名北京知青的身份来到梁家河村，从“什么都不会”到“一把好手”，从“不了解”到“接地气”再到深深热爱这片魂牵梦绕的地方。习近平在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对人民群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他后来离开梁家河村时，“早上一起来推开门呢，外面都站满了老百姓、乡亲们”为他送行，13名社员一直把他送到了延川县城。正如他所讲：“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采访时说，“陕北高原给了我一个信念，也可以说是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经过了陕北这一堂人生课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它教了我做什么”。

习近平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2012年11月15日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此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架起了民生领域改革的“四梁八柱”，突破了许多以前没有突破的关口，解决了许多以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健全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了民众私有财产；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促进了人口均衡发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促进了教育改革发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破除了“以药养医”的“老大难”；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补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不断丰富了“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治国理政实践，人民群众收获了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基础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累积的一些问题开始凸显，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亟

待优化升级，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房地产库存长期保持高位，杠杆率过高、债务增速过快，企业生产成本过高，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等等。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将稳中求进作为经济工作的总基调，采取一系列战略措施，科学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牢了经济基础。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在淘汰水泥、平板玻璃等落后产能基础上，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加大去产能力度，安置分流职工110多万人，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予以支持，用于分流职工安置。退出钢铁产能1.7亿吨以上、煤炭产能8亿吨。因城施策分类指导，三四线城市商品住宅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热点城市房价涨势得到控制；积极稳妥去杠杆，控制债务规模，增加股权融资，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连续下降，宏观杠杆率涨幅明显收窄、总体趋于稳定；多措并举降成本，压减政府性基金项目30%，削减中央政府层面设立的涉企收费项目60%以上，阶段性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推动降低用能、物流、电信等成本。二是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深入开展“互联网+”行动，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深刻重塑；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进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重大工程，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出台现代服务业改革发展举措，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促进了各行业融合升级；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经营主体大批涌现，种植业适度规模经营比重从30%提升到40%以上；采取措施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推动传统消费提档升级、新兴消费快速兴起，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长3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1.3%；高速铁路运营里程从9000多公里增加到2万5千公里、占世界三分之二，高速公路里程从9.6万

公里增加到 13.6 万公里，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127 万公里，新建民航机场 46 个，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122 项，完成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动宽带网。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发展新动能迅速壮大，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这是我们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着力激发社会创造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创新生态，形成多主体协同、全方位推进的创新局面。扩大科研机构 and 高校科研自主权，改进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深化科技成果权益管理改革。支持北京、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新设 14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带动形成一批区域创新高地。以企业为主体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涌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and 新型研发机构。深入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普惠性支持政策，完善孵化体系。各类市场主体达到 9800 多万户，五年增加 70% 以上。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加两倍，技术交易额翻了一番。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为主转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创业热土。

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为切口，不断增强发展动力。2012 年至 2017 年，全面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革，兼并重组、压减层级、提质增效取得积极进展，2017 年国企实现利润增长 23.5%；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全面推行财政预决算公开，构建以共享税为主的中央和地方收入分配格局，启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大幅增加、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减少三分之二；基本放开利率管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深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改革，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机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出台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方案；实施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长期实行的药品加成政策，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确权面积超过80%，改革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这些领域的深入改革，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以合作共赢为理念，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倡导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起创办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一批重大互联互通、经贸合作项目落地；设立上海等11个自贸试验区，一批改革试点成果向全国推广；改革出口退税负担机制、退税增量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设立13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覆盖全国，货物通关时间平均缩短一半以上，进出口实现回稳向好；外商投资由审批制转向负面清单管理，限制性措施削减三分之二，外商投资结构优化，高技术产业占比提高一倍；加大引智力度，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增加40%；引导对外投资健康发展；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高铁、核电等装备走向世界，新签和升级8个自由贸易协定；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启动，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中国开放的扩大，有力促进了自身发展，给世界带来重大机遇。

与此同时，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财政收支矛盾较大情况下，着眼“放水养鱼”、增强后劲，率先大幅减税降费；分步骤全面推开营改增，结束了66年的营业税征收历史，累计减税超过2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实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降低利息负担1.2万亿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盘活沉淀资金，保障基本民生和重点项目；财政赤字率一直控制在30%以内；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广义货币M2增速呈下降趋势，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采取

定向降准、专项再贷款等差别化政策，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改革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外汇储备转降为升；妥善应对“钱荒”等金融市场异常波动，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通过上述组合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成就显著，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增长7.1%，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财政收入从11.7万亿元增加到17.3万亿元。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1.9%，保持较低水平。城镇新增就业6600万人以上，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这些成就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长与质量、结构、效益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延伸阅读 4-2:

中国经济是如何赢得未来的

2017年11月，美国《时代》周刊提前出版，刊发了一篇由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撰稿的文章——《中国经济是如何做好赢得未来的准备的》。此文一经刊出，引起美国人的高度关注和激烈讨论。

在这篇文章中，布雷默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11月为期10天的亚洲之行中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日本和韩国，他必须让这两个紧张不安的盟友放心——“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美国已将地区主导权让出。在越南和菲律宾，他必须传达美国对平衡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浓厚兴趣。当然，最重要的一站是北京。但在他访华之时，全球经济中最为强大的参与者是中国，而非美国。

布雷默称，如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更为完善，甚至可能比美国的制度更具可持续性，后者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在全球制度形式中占主导地位。据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预计，尽管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但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有望在 2029 年超越美国的经济总量。

当然，这与美国可谓息息相关。美元仍是全球储备货币，这种过分的特权可能还将持续多年。但是，美国的力量支柱——军事同盟、贸易上的领导地位以及推广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意愿——正在被“侵蚀”。

在文章的最后，布雷默很坚定地说道，中国政府会制定一些法律来专门帮助战略产业发展，在技术变革的速度和规模即将成为全球最重要变量的时代，这种级别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政府对其经济更好的控制将有助于承受某些在世界其他地方会产生更大影响的冲击。

二、发展民生事业提升人民获得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核心的指标就是人民的生活幸福、富足、安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努力让全体人民能够拥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等，人民的获得感持续上升。

坚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教育差距，努力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一是全力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加大财政支持农村教育的力度，推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工程，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和教学点的办学条件。继续实施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4 年将每生每天的补助标准提高到 4 元。自 2012 年起，先后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

定向招生”“部属高校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和“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等三项专项计划，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二是大力提升中西部教育发展水平，缩小区域教育差距。在高考政策上进行倾斜，提高中西部省份高考录取率，扩大“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规模，安排专门招生指标，招收升学率相对偏低的中西部省份学生。加大中央财政投入，支持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通过设置少数民族预科班和民族班形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入学率；通过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层次人才。三是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通过一系列措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范围，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严格实行就近入学的办法，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法律规定，推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合理规划招生范围，实行对口入学、阳光招生等举措，着力做好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择校热”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均衡校际教育差距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四是完善教育资助体系，充分发挥其为教育公平“兜底”的功能，加大对特殊群体扶持力度，进一步缩小群体间的教育差距。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切实保障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了县级和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明确了改革原则、目标、路径和主要任务，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30多项配套政策，改革的制度框架、路径方法逐步完善。改革取得进展主要体现在：一是全力推进医药分开，坚决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十八大以来的公立医院改革首先下大力气解决以药补医，要求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切断医院层面“医”与“药”的利益联系，切实降低药品的虚高价格。同时改革药品购买招标机制，对县级医院用药实行“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的方式；对部分价格虚高、临床必需的专利药品、独

家生产药品开展谈判试点，切实降低了药品价格和群众的负担。二是逐步建立科学补偿机制，保障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转。各地政府通过增加政府投入，推动医院通过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加强核算、节约运行成本等措施，保证了公立医院的合理收入。一方面适当降低检查、检验等价格，同时适当提高技术劳务价格，使医疗服务价格较好地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另一反面通过提高医保的保障水平，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等，使群众就医的负担不会因为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而增加。从试点城市的改革情况看，改革后三级公立医院次均诊疗费用和人均住院费用增长率得到有效控制，在降低诊疗价格的同时，也保障了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转。三是推进分级诊疗，缓解“看病难”问题。一方面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按需就医、就近就医；另一方面多措并举加强社区医院等基层医院的建设，提高其医疗水平。经过改革，与2010年相比，2014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人次分别提高了17%和54%。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业是民生之本，党中央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并且把实现就业更加充分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一是保持了稳定的就业态势，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失业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首先从就业总人数来看，我国的就业人数由2012年的76704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77603万人，增加了899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由2012年的37102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41428万人，年均增加1082万人。其次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来看，2012年至2016年这五年间城镇新增就业，始终保持在1000万以上，2013年，突破了1300万人大关，2014年达到了1322万人，2015年增加1312万人，2016年增加1314万人。第三，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失业率来看，2012年至2016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一直低于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左右，同期，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也保持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我国能在经济

形势下行的压力下年均保持 1000 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同时将失业率维持在 4.1% 左右的低点，这是近年来就业保障工作的最大成绩。二是不断优化就业结构，推动多元化就业。首先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从 2012 年的 33.6 : 30.3 : 36.1 转变为 2016 年的 27.7 : 28.8 : 43.5。其中，第一、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和就业比重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 2011 年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后，继续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已经成为带动我国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三是采取有力措施保障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中西部就业，实行大学生“村官”计划、西部志愿者计划、教师特岗计划，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去，到基层去；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去，特别是中小企业就业。通过采取多种形式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2012 年至 2016 年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基本上维持在 70% 左右，年底总体就业率超过 90%，总体上解决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采取多种措施，构建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一是大力推动养老保险事业，保证“老有所依”。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更加完善，实现了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两项制度的衔接；解决了职工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流动就业时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基本形成了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接续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体系；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推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16 年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共计 88777 万人，比 2012 年年末增加 9980 万人；其中领取待遇人员 25373 万人，比 2012 年年末增加 4852 万人。养老保险基金规模持续扩大，2016 年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达到 37991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16161 亿元，年均增长 14.9%。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稳步提高，城镇企业参保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大幅度提高，经过连续调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从 2012 年的 1686 元提高到 2016 年的 2362 元，增长了 676 元，年均增长

8.8%。2016年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首次同步调整并发放到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也不断提高。2016年年底，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17元，其中月人均基础养老金达到105元，基本实现5年翻一番的目标。二是全力促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保证“病有所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取得积极进展，基本医保制度公平性进一步提高，参保人员特别是农村居民保障水平得到提升。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2012年开始试点；2015年所有地市启动实施，大病保险支付比例达到50%以上；2016年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对贫困人口等困难人员在起付线、报销比例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2017年开始加强医疗救助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有效衔接和经办协作。医疗保障的范围逐步扩大，2017年印发了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西药、中成药部分共收载药品2535个，较上版目录（2009）新增339个，增幅约15%。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整体推进，复合式的医保付费方式初步建立，医保控费作用进一步加强。逐步扩大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范围，基本满足了参保人员就医购药的需求。

建立健全保障制度，织牢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一是继续推进社会救助事业。社会救助是国家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社会救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2014年2月，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一次以行政法规形式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八项社会救助制度和社会力量参与，构建了一个分工负责、相互衔接、协调实施，政府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二是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改善困难群众的居住环境。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资金补助和信贷支持力度，有力推进了公租房、廉租房建设，截至2016年年底，已有1126万户家庭住进了公租房，城

镇低保、低收入家庭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同时，国家对于棚户区改造工作也十分重视、全力推动。2013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对十八大后的棚改工作作出了总体要求，并且提出了“2013年至2017年改造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使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的目标。201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对棚户区改造工作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并制定了2015年至2017年改造各类棚户区住房1800万套的三年计划。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指导下，我国棚户区改造成绩显著：2015年棚改开工601万套，2016年开工606万套；自2008年开始棚改工作以来，8年间改造了3000多万套房屋，让8千多万居民住上了新楼房。住房困难家庭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各项民生事业的发展和惠民政策措施的出台和落地，既体现了党和政府保障民生的决心，也顺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促进了民生事业持续改善，保证了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延伸阅读 4-3:

共享小康——《辉煌中国》第五集

这一集讲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大批民生工程正在惠及全体人民。

源于《诗经》的小康，是古代思想家描绘的社会理想，是中国百姓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今天，百姓对小康生活已经有了新的期待。人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

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辉煌中国》讲道，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四年超过12000亿斤，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养育好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4%，在全球九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率先实现了全民教育目标。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中国织就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被世界卫生组织称赞为举世瞩目的成就。片中提到，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提高到76岁，超出世界平均水平5岁，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2亿的国家，中国做到了养老金连续12年上调。

治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五年来，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44.3%，中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超过1300万人；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2879万套，13亿多中国人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0.8平方米。此外，“中国天网”大工程成为守护百姓的眼睛。根据2016年全球犯罪与安全指数显示，中国是治安保障最好的国家之一。

今天的中国，正在让13亿多人民拥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精准脱贫成效显著

小康社会最基本的要求是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实现生活富足，但是我国现在还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这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贫困地区考察调研，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为精准扶贫事业发展指引方向。

为切实推动精准扶贫工作，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对脱贫攻坚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出台100多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各地也相继出台和完善了脱贫攻坚系列文件，内容涉及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农村危房改造等。为落实文件精神，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投入，明确规定扶贫投入力度要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相匹配。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中央财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2800多亿元，年均增长14.5%，支持贫困革命老区推进扶贫开发。仅2016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首次突破1000亿元，其中中央投入资金667亿元，同比增长43.4%；省级投入资金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长56.1%。同时积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的支持力度，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3113亿元，共支持了868万贫困户；保险业扶贫、证券业扶贫的工作力度也明显加强。此外，为确保精准扶贫落到实处，党中央出台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对各地各部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开展督查巡查；督查坚持目标导向，着力推动工作落实；巡查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扶贫部门加强与纪检监察、巡视、审计、财政、媒体、社会等监督力量的全方位合作，把各方面的监督结果运用到考核评估、督查巡查中。同时，还出台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规定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对各地减贫成效、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进行严格考核，涉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减少和贫困县退出计划完成、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群众帮扶满意度、扶贫资金绩效等指标。这些监督考核机制出台，目的就在于确保脱贫攻坚质量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精准扶贫工作有序开展起来。具体体现在：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交通建设方面，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农村公路、农村客运站点和“溜索改桥”的建设步伐加快，大部分的乡镇和建制村铺设硬化路、通了班车。电力建设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无电地区电网延伸和可再生能源供电工程，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电力建设的投资支持力度，全国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通信设施建设方面，实现100%的行政村通电话、100%的乡镇通宽带，基本完成对20户以下已通电自然村广播电视覆盖，有效提高了贫困地区的宽带网络普及率。居住环境方面，中央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危房改造工程补助标准，帮助贫困农户解决最基本住房安全；全面推进贫困地区农村垃圾治理，改善居住环境。

贫困地区特色产业脱贫得到扶持。国家明确将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作为农业行业扶贫重点工作，对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特色农林牧业进行科学布局，明确发展重点。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向连片特困地区投入农业、林业基本建设资金和财政专项资金，通过政策支持，贫困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贫困户能够分享到农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值收益。

贫困地区易地搬迁脱贫稳步实施。党的十八大后，加快了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进度。同时完善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确保搬迁对象有业可就、稳定脱贫，做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仅2016年，全国就有249万人“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截至2016年10月底，易地搬迁的贫困人口本地落实就业岗位45.18万个，产业扶持126.19万人。

贫困地区生态保护脱贫持续推进。在贫困地区积极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石漠化综合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推进贫困地区的生态补偿工作；加大贫困县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强化木本粮油、特色林果、木竹原料林、林下经济、草食畜牧业、生态旅游等发展，切实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条件。

贫困地区教育脱贫力度不断加大。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改造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对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改善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教师生活条件。发放支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专业除外）。对全日制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受惠学生由2012年的1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6万人，许多贫困地区首次有了国家重点高校的大学生。

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脱贫全面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完善，覆盖97%以上的农村居民。2016年，新农合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420元，政策范围内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50%和75%左右。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覆盖超过10亿参保居民，报销比例不低于50%。

贫困地区就业创业服务不断加强。组织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春潮行动”，面向农村贫困劳动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并落实培训补贴政策。落实《关于加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对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的给予补助。组织开展“春风行动”等专项就业服务，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和稳定转移。积极落实创业扶持政策，提高创业成功率。

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还积极探索实行资产收益扶贫。2014年年底，国家启动光伏扶贫试点工作，在安徽、河北、山西、宁夏、甘肃、青海6省区开展试点，通过资产收益扶贫增加贫困地区“造血”能力。2016年，国家大力推进光伏扶贫，计划在2020年之前，重点在前期开展试点的、光照条件较好的16个省区471个县约3.5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以整村推进的方式，保障200万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包括残疾人）户均年增收

3000元以上。

经过五年的努力，我国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3046万人，累计减少685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年末的10.2%下降至3.1%，累计下降7.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增长。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显示，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77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加894元，名义增长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1%，实际增速比上年快0.7个百分点，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1.8个百分点，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进一步夯实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这一方面不仅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维度，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五年来，党中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重拳整治大气污染，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_{2.5}）平均浓度下降30%以上；加强散煤治理，推进重点行业节能减排，71%的煤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优化能源结构，煤炭消费比重下降8.1个百分点，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高6.3个百分点；提高燃油品质，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2000多万辆。加强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防治，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推进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展中央环保督察，严肃查处违法案件，强化追责问责；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签署生效，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过去五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基础上，2017年党的十九大向全党明确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同时，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新的“两步走”战略，指出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为我们描绘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前景，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前所未有的高度自信、敢于担当的精神状态、强大的决心和信心。

延伸阅读 4-4:

福建宁德滴水穿石三十年

从福建宁德市区到宁德寿宁县下党乡，车向西北行，至少要经过15条隧道。白沙隧道、江家渡隧道、铜岩隧道、岭头隧道……每个隧道，都代表着闽东一座山。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用另一种方式来到这里。在坐车颠簸几个小时后，路没有了。他沿着山中小径徒步两小时才进村，现场召开扶贫办公会，又用了3个小时披荆斩棘走出这片深山。

那是他就任宁德地委书记的第二年，是中国提出“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第五年。在宁德期间，他以脚步丈量了闽东的山容海纳，开启了带领贫困群众走出大山的“凿空之旅”。三十年后，当宁德贫困发生率已降至百分之零点零几，由闽东大地策源的脱贫思想，正在推动21世纪的中国迈向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当年的“滴水穿石”，与今天的脱贫攻坚呈现着同样的战略定力；

当年的“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凝练为今天的精准扶贫思想；

当年的“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发展为今天的“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

当年的“把心贴近人民”，今天有了更为有力的表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三十年前赴后继，三十年一以贯之。脱贫路上的宁德样本，由此被历史地放入了更大的时空坐标中。

“滴水穿石”“弱鸟先飞”

下党乡71岁的老人王光朝，至今记得1989年盛夏的那一幕。

以150多年历史的文昌阁为背景，之字形的石径上走下了一队人，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头上戴着草帽、肩上搭着毛巾、手里拿着木杖的习近平。“我都记得，走到下党十一点多了，（习近平）一条毛巾都是汗哦，老百姓纷纷喊着‘地府（知府）来了’‘地府来了’，我们自己煮了凉茶，挑着担桶给他送去。”

这是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下党乡，第一次迎来地委书记这么大的官。四户极度贫困的家庭里，坐下了知心人；连门都没有的简陋小学教室，成了扶贫现场会的会场。

“找了块红纸，写上了‘会场’两个字，贴上了。桌子上铺的布，是不知从谁家找的被面。”下党乡原党委副书记刘明华参与了现场会，每一个细节都仿佛在眼前，“老百姓找遍全村，找出仅有的一瓶罐头给习书记送去了。习书记把里面的罐头倒在碗里，送给了会场的一个老婆婆，自己用空瓶子装凉茶喝。”

贫困，如大山围困，如重石压心。习近平提出，要率先解决公路、水电和办公三大问题。他还对带去的地、县相关部门负责人说，“大家都是翻箱倒柜、竭尽全力的，尽可能解决问题”。

山坳乡村下党的历史，在这个见到“地府”的夏天翻开了新篇。在习近平下党之行的第二个月，拿着上面“翻箱倒柜”下拨的72万元，下党公路和电站两个项目先后动工。刘明华说：“马上就干起来了。总书记当时考虑得非常长远，要想富先修路，建电站则等于给我们抓一只‘老母鸡’，可以生蛋的。”1991年1月，13公里的进乡公路建成；同年12月，下党电站建成。

一度被列入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宁德，同样在这两年时间中实现了深层变革。闽东九县甚至比邻的温州、苍南、乐清，都留下了习近平的足迹，仅下党乡所在的寿宁县，就曾经九次迎来他的访贫问苦、基层办公。他大力倡导的“滴水穿石”精神、“弱鸟先飞”意识、“行动至上”作风和“四下基层”制度，不仅使当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

解决，更深度雕刻了闽东大地，造就了今天的闽东气质。

三十年久久为功，无数个下党故事，千万人的命运转折，几届宁德党委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力攻坚，最终被历史提炼成了一串数字：截至2018年4月，宁德市累积脱贫77万多人、造福搬迁近40万人。目前，宁德贫困发生率已经降至0.028%。同期，全国的贫困发生率是3.1%。

今天，当记者从那条改变历史的公路进入下党，每一处景观都在无声地讲述着闽东从老书记那里继承的定力与干劲。盘山路的起点，“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牌子立在路边；沿途每隔几百米，写着“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小红旗迎风飘动；中心村村口，“红色旅游开发建设系列项目推进计划表”标牌背后，施工的村民人头攒动，新的建筑已经拔地而起。

王光朝老人，两年前开起了一家茶馆，起名“幸福茶馆”。问及名字的渊源时，他说：“幸福下党，难忘习总书记。没有总书记当年来下党，没有他牵挂着下党，下党的幸福从哪里来？下党人知恩，感恩。”

“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

在宁德所属的福鼎市赤溪村，如果你问一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当年有几亩地，他会忽然愣住。在这里，土地不论“亩”，甚至不论“分”，只论“能出几担谷子”。甚至，用两只手一划拉，就能比量出自家田地大小。

赤溪村，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1984年，时任福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王绍据把赤溪村的贫困状况投书媒体，引发了中央关注。和闽东绝大多数村庄一样，它的土地资源被山与山挤压到最低限度，北中国动辄千里沃野的景象，在这里几乎不能想象。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田地的稀缺与山海资源的丰厚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1988年9月，在闽东九县深入调研后的习近平，重新梳理了“山”与“海”的辩证法：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

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这就是说，在农业上，“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发展乡镇企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王绍据记得，针对赤溪村所在的福鼎市，习近平还曾专门指出：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坚持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行”了。这段话，记载在1988年8月11日印发的《福鼎通讯》上。

因地制宜打开了闽东视野，也带来了赤溪村对自身的再认识：路无一丈直、地无三尺平，14个自然村，有的甚至是“挂”在了山上，一方水土已难养一方人。由此，当地创造性提出“整体搬迁”思路，从最困难的22户88位畲族群众开始，将12个自然村陆续迁至赤溪行政村所在地。进入新世纪后，赤溪更是在生态优势和山地资源上做足了文章，背靠太姥山景区，把整个村庄变成旅游景点，村就是景，景就是村。绿水青山就是“银行”的预言，在三十年后得到印证：2017年，赤溪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16000多元，村财政收入达到了80万元。

“山海经”的哲学，在几十年中赋予了每个脱贫致富的闽东村庄以独特的标识。今天的宁德人，会对各个村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数家珍：下党，定制茶园；赤溪，旅游扶贫；柏洋村（福鼎市），产业致富；下歧村（福安市），海蛭养殖；北歧村（霞浦县），滩涂摄影……千村百景，月映万川。

2016年2月19日，在人民日报社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网演播室，与赤溪村村民进行了视频连线。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在宁德讲过，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做到了，你们的实践也印证了我们现在的方针，就是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

在视频连线的另一头，一辈子为赤溪脱贫奔走的王绍据眼睛湿热。“这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再次号召。”他说。

“必须有个好支部”

福鼎市硿门畲族乡柏洋村，是年社会生产总值超过20个亿的明星

村。宽阔的村文化广场边上，“群众说事党小组”的办公室引人关注；整洁的村委会大厅里，基层党建“五心”工作法的牌子尤为醒目。

“五心”是指工作有信心、办事有公心、发展有恒心、为民有爱心、团结有诚心，每一“心”有专门所指和细化内容。围绕这一工作法，柏洋村形成了一整套周密的村务管理、公开、“话事”制度，统筹特色农业与工业企业，持续推动着“山海并进、产业富村”。

村党委书记王周齐感慨：“总书记当年在闽东工作时曾说过，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柏洋村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关键就在于我们这些年狠抓党建不放松。”

闽东父老都记得，两年主政宁德，习近平逐步建立了以“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主要内容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坚决反腐倡廉、严惩违法乱纪、整顿干部建房、造就了党建大气候。一句（如果不讲廉政）“那么我们的事业还有什么希望，我们何以取信 270 万闽东人民”，音犹在耳、掷地有声。

以党建引领脱贫，被实践检验，以实践传承。在闽东，记者采访过的每个乡、村干部，都会率先提到党建的话题；走访过的每个脱贫村，都有自己丰富的党建经验；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活跃度，从深层次上塑造了一方水土的精气神。近年来，为贯彻“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的重要思想，宁德市选拔优秀“老乡镇”进入乡镇领导班子，从经济能人、返乡大学生当中推选 8000 余名村“两委”班子成员，选派了第五批 365 名机关党员干部驻村任第一书记、1640 名干部驻村蹲点，安排近 8000 名干部包户扶贫。看房、看粮、看有无读书郎、看主要劳力强不强、看有无病人卧病在床，真正实现每个贫困村、贫困户都“有人挂”“有人帮”。

摆脱贫困，已经成为写在闽东大地上的当代史。

同时，也早已不仅是闽东历史。

1992年，《摆脱贫困》一书即将付梓。在书后的“跋”中，习近平写道：“在这本书中，我只提供一份我在闽东实践、思考的记录，这对于闽东脱贫事业和其他事业之宏伟大厦或成为一石一木，对于后来者或许也有些微意义——若留下探索，后人总结；若留下经验，后人咀嚼；若留下教训，后人借鉴；若留下失误，后人避免。”

三十年奋力摆脱贫困，闽东已经别开生面。而十三亿多中国人民，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终将在2020年彻底与绝对贫困挥别。

资料来源：张政、刘文嘉、高建进：《滴水穿石三十年——福建宁德脱贫纪事》，载《光明日报》，2018年5月31日。

改革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不会有中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视察工作，在这个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深情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强调要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2012年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在这次集体学习讲话时，习近平总书记将改革定位为两个“关键一招”，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改革开放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和关键性意义。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改革的时态论，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现在，推进改革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改革开放

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改革时态论将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开放的长期性认识发展为持久性认识，强调改革的持久性，既是对历史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奋斗的期许，展示了党中央深谋远虑、责任担当和继续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勾画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壮阔前景。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专门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突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紧紧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等六大改革主线，涵盖了15个领域、包括60个具体任务。这个《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合理的布局，为改革规划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为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绘制了细致的蓝图。以此为标志，中国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

这份具有历史影响的《决定》，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突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即“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其他什么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使党和人民冲破重重阻力，克服千难万险，达到预定的目标，取得预期的成果。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在实践中发展改革的理论，积攒更多的智慧成果。

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即“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看似简单的两句话，实质上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指南针。总目标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层面，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治理层面，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体设计。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对全面深化改革设计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共提出十五个方面的改革任务，充分体现了新一轮改革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其中：（1）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和总体战略中。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人民代表大会与时俱进，推动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

推动基层民主制度的完善。(3)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主导作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迈上新台阶。(4)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方向。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其基本框架包括政府切实履行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责，公众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事务，自治和他治协调配合，法治保障坚实有力。(5)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任务。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围绕建设美丽中国这一主题，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战略重点、推进方式和发展目标，为建设美丽中国、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深入推进指明了方向。(6)把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突出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7)把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决定》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起进行整体部署。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着眼点正是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保证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我们要把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改革开放有机衔接起来，把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创新有机衔接起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就改革的广度而言，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是单单某一方面的改革，而是全局性的改革。从《决定》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来看，格外注重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促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促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定》，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反响，在世界范围内也引起了轰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世界媒体纷纷给予高度关注，积极评价会议释放出的重要改革信号，报道了大量有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信息。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未来五至十年经济政策路线。中国领导人对于改革的热情不容低估。中国未来可能会更加重视国内消费、金融创新，并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是中国朝新方向迈出的一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重大变革，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是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的机构。德国《世界报》称：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的增速不再只同中国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就连德国也从未如此依赖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领导层承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受到中国人民欢迎、世界投资者期待的改革决策。

二、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为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同志担

任副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①。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6个专项小组，即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小组，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小组，文化体制改革小组，社会体制改革小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小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小组。各地区各部门也迅速建立健全党委（党组）领导下的工作机制，统领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定期审议重大改革方案，深入评估方案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存在的问题风险，明确政治底线和社会稳定底线等，重大问题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确保重大改革论证充分、决策科学。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领导小组坚持重点抓好具有结构支撑作用的重大改革，选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作为突破口，并对一些重大问题开展试点探路，充分彰显党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力度和自信。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对序盘阶段的改革工作提出了总要求，制定了2014年工作要点，排出当年要完成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予以重点督办。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逐项明确了336项重要举措的目标、路径、时间节点和可检验的成果形式，为未来7年全面深化改革绘制了完整系统的大施工图。2014年8月和12月，领导小组分别审议通过了上半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和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总结报告，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明确改进工作的方向措施，12月提出领导小组2015年工作要点和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2015年工作要点，对新的一年改革任务提前作出明确部署。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要把全会提出的

^① 2018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190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纳入改革任务总台账，一体部署、一体落实、一体督办。

领导小组成立后，始终把抓落实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实施方案要抓到位，实施行动要抓到位，督促检查要抓到位，改革成果要抓到位，宣传引导要抓到位……”习近平总书记对狠抓工作落实提出了“五个到位”的明确要求。从及时总结地方推进改革情况，对苗头性倾向及时打招呼提醒，到中央改革办成立督察局，专司改革方案督检之责；从强调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到强调要考核验收改革竣工结果，没有完成或完成不到位的要问责。同时，极力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从在重大改革方案中留出政策空间，鼓励不同区域差别化探索，到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具备可复制可推广价值的经验及时在更大范围推行；始终注重使改革的思路、决策、措施更好满足群众诉求，做到改革为了群众、改革依靠群众、改革让群众受益。从把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和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标准，到试点实施要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尊重基层群众实践，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以来，以务实的工作作风一手抓审议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改革议题，一手抓研究部署各领域改革的协调推进，推动改革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从强调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到强调把狠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从强调改革要坚持从具体问题抓起，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从提出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严把改革督察关，到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从鼓励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到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在这样一个又一个工作节点的清晰标注下，扎实稳健向前迈进。

三、稳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生机。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全盘推出、步步深入。四年多来，党领导人民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具体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很大进展。国务院重点围绕投资和生产领域，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实施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改革商事制度实行“先照后证”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从推动建立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和企业服务“一张网”，到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一项项改革举措直指“审批多”“审批难”顽疾，释放简政放权的强烈信号。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出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三项重点任务。按照财税体制改革思路和部署，在助推结构调整、激发市场活力，特别是为现代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松绑提速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力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营改增试点进一步扩大到铁路运输业、邮政服务业、电信业，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在全国范围实施，完善促进就业创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减少和规范涉企收费，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等。三是稳步推进金融改革。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国务院审慎把握、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扩大同业存单发行主体范围，有序放开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首批5家试点民营银行获准筹建，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四是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先后出台了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决定将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着手改进完善院士制度；在更大范围推广中关村试点政策，加快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选择部分中央级事业单位开展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改革试点等一揽子科技改革方案。五是启动农村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三块地”的改革。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强调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部署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强调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全面深化司法制度改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在上海等6个省份启动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广东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激发社会创造力。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开展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制定《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着手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解决。建立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加大司法公开力度；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在12个中级、基层法院试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制定深化公安改革的框架意见等，一批基础性、制度性措施相继推出。在地方，河南全面推行新型合议庭制度，云南建立市、县、乡三级联动视频接访机制，甘肃出台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江西出台医疗纠纷预防处置条例等，开展了司法制度改革实践。

延伸阅读 4-5:

公正司法——人民群众永恒的期待

2016年12月2日，隆冬的沈阳寒风凛冽，而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内，正进行着一场正义而温暖的宣判。胡云腾大法官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一个迟到了7890天的正义结果终于来临。2013年以来，人民法院依法纠正重大冤错案件39件，涉及78名公民。聂树斌、呼格吉勒图、张辉、张高平、陈满……这一个个令中国司法倍感沉重的名字，逐步沉冤得雪。

比自我纠错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为此，一场加强司法人权保障、从源头防范冤假错案的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恢弘展开。2016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启动。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是一个确保审判程序的合法化、正当化，防止非法证据进入最后的裁判结果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诉讼制度改革。这个诉讼制度改革对于防范冤假错案，对于排除非法证据，对于确立审判的高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法庭调查“三项规程”等一系列制度密集出台，筑牢了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基础和程序防线，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已逐渐成为刑事审判新常态。上海、贵州高院开发刑事审判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将机器智能审查证据与人工审查相结合，有效防止刑事案件“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

“有恒产者有恒心”，人民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同等重要，司法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一个都不能少。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見》《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等意見，切实依法加强产权保护，依法甄别纠正涉产权错案，用公正司法筑牢产权保护的坚实堤坝。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将依法再审张文中、顾维军等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彰显了依法保护产权、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决心，被企业家称为“法治建设的重大利好，企业界、投资界和工商界的重大利好”。案件当事人之一、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中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感慨：“最高法院史无前例地公开审理一个涉产权的民营企业案件，让我感动。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企业家群体的关注，对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对企业家创业环境的改造，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推进依法治国的又一个新起点。”

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创新体制机制为重点，各项改革举措依次启动、精心实施，推动改革向面上展开、向纵深推进，引领着文化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文化建设呈现新气象、新面貌、新格局，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各省区市都已按照中央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扎实推进。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建设，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文化支持力度，引导社会参与。制定下发《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强化内部管理，整合媒体资源，实现内宣外宣一体化发展。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迈出新步伐，探索建立具有文化

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文化企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进一步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统筹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理顺内外宣体制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管理体制，密集出台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涉及支持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和文化企业发展、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支持电影繁荣发展等诸多政策利好，为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体制改革。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全国各省区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开展养老服务业和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陆续推出了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出台了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政策，健全了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了低保等城乡困难群体救助水平，发布实施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改革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全国推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完善了基本药物制度，扩大了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实现了公租房、廉租房并轨运行，启动了共有产权住房试点。针对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央出台了一整套教育综合改革措施：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启动沪浙两地高考招生改革试点，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例，制定上海市和北大、清华综合改革方案，推进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和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校园足球等。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慎布局，大胆出手，在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的同时，一揽子加快推进城乡养老并轨、城乡医疗救助并轨、进城务工人员基本医疗服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等重点领域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举打破了“农业”与“非农”壁垒。

构建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确定了任务。先后出台了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和国有林场改革方案，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推动市县“多规合一”试点，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加大处罚力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强化节水准入，开展水权试点，《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先后制发，以硬约束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燃煤小锅炉和老旧汽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分别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坚持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三管齐下”，以总量控制、源头治理、区域联动的努力，争取“雾开霾散”。2015年1月1日，经过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新《环境保护法》把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明确规定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实施统一的防治措施，使环保监控更强、更有力。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总体构想和工作方案，推动我国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北京完善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黑龙江开展国有林区管理体制改革，湖北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改革，西藏制定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青海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奖资金与保护责任及效果挂钩。总之，在全国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正在形成并发挥效用。

延伸阅读 4-6:

三江源国家公园：打造美丽中国生态之窗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安全屏障。20世纪末，人类牲畜活动加

剧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使这一地区草原、湖泊、冰川等生态系统发生退化。为此，国家于2005年建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至2015年，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10年来累计投入的资金接近90亿元，近10万牧民搬离了草原，超过70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了牲畜养殖数量，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草地产草量整体提高了30%。但是，三江源地区仍存在社会保护参与度不高、牧民增收渠道狭窄，政府各部门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

为此，2016年4月，青海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部署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提出将力争于5年内建成三江源国家公园。根据部署，青海将以“一年夯实基础工作，两年完成试点任务”为目标推进工作，最终于5年内将园区打造成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先行区，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示范。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对外公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明确至2020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规划的中期目标是到2025年，保护和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全面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形成独具特色的国家公园服务、管理和科研体系，生态文化发扬光大；远期目标是到2035年，届时三江源国家公园将成为生态保护的典范，体制机制创新的典范，我国国家公园的典范，建成现代化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建立，将整合各部门、各地区职能资源实施生态整体系统修复，以理顺三江源保护机制、提升保护科学性。同时更加注重相关农牧民生活的改善，通过合理利用现有生态资源打造一批可吸纳就业的旅游、有机农牧等绿色产业，让群众共享生态保护红利，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模式。

稳步推进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全面实

施改革强军战略，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
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国防和军队改革主要是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军委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中央军委由四总部制改为军委多部门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组建了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领导机构，将七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落实裁减军队员额30万；改革部队编成，推动部队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构建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推进军队政策制度改革，重点完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和后勤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健全相关体制机制；优化武装警察部队力量结构和指挥管理体制等。同时，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诞生，军队组织架构实现历史性变革。

延伸阅读 4-7:

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了“铭记光辉历史 开创强军伟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他强调，90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卓著功勋。人民军队砥砺奋进的90年，凝结着坚定理想信念、优良革

命传统、顽强战斗作风，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鼓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和全军广大指战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

推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肩负着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引领全民族复兴圆梦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持续发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立行立改，在猛药去疴的同时着力固本培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愈加坚强有力。

党中央制定出台并率先垂范、带头践行八项规定，党风为之一新，民心为之一振。完善巡视制度，由中央纪委向中办、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办、全国政协机关这7家单位派驻纪检组。推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纪检监察全覆盖。出台《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从深化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4个方面，提出了55项具体改革任务。至2017年6月，中央制定共出台50余部重要的党内法规。

四年多来，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阻碍发展活力和社会活力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动力量，以其新的能量、新的力度、新的气势，决定着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广阔空间和深层变化，塑造着新时代的全新风貌。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是，必须看到，重大成就与重大矛盾同时存在，光明前景与风险隐患同时存在，发展动力与发展阻力同时存在。这是一个唯有坚定改革才能解决重大矛盾的新时代，是一个唯有攻坚克难才能化解风险隐患的时

代，是一个唯有自我革命才能根除发展阻力的新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的近40年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兴旺发达之道、民族飞跃之道、人民幸福之道；从十九大到本世纪中叶的30多年实践还将继续证明，全面深化改革仍然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延伸阅读 4-8: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势如破竹开新局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机构建设和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党领导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各方面工作不断深入的需要，我们党积极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各方面机构职能不断优化、逐步规范，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机构职能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机构职能体系的重大转变，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领域，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2年12月，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首赴地方考察，便来到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既挂帅又出征。十八届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先后召开38次会议，出台1500多项改革举措。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深化机构改革进行调研。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

2017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深化机构改革问题。

2018年2月26日至28日，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2018年3月21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全文对外公布。

2018年3月23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揭牌。

在各部门扎实推进、积极作为的进程中，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已经开

始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切实增强——

4月20日起，海关、检验检疫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整合实行一个窗口办理，进出境旅客随身行李物品通关实现“一次查验”，邮件快件监管由原来的26个环节精简为10个环节，通关成本大大降低；

被公众称为“诗和远方终于在一起”的文化和旅游部，在挂牌前后开展一系列工作，包括发布《2018年春季假日旅游指南》，组织开展网络表演、网络游戏市场集中执法检查等，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

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运转、英雄烈士保护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全票通过、沈阳网民发布侮辱因公牺牲民警的言论被依法批捕……一系列重视英烈、关切退役军人的举措，回应着广大民众让“最可爱的人”不再流血又流泪的心声。

按照党中央对于此次机构改革要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要求，各部门科学设置职能、工作有主有次，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运行更加高效的效果初步显现——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农村部，进一步加强了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抓“脖子以上”服务顶层设计，也抓“脖子以下”的实施落实，把决策参谋、贯彻落实、推动实施整合在了一起，并整合了原来分散在几个部门的涉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职责，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支撑手段更加有力；

整合了原本分散在水利部、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的水环境治理职能后，生态环境部已经开始部署在今年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及城镇和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多个专项行动，打赢“碧水保卫战”的步伐变得更加有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原国家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整合到一起集中办公，优化行政资源，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服务

水平，减少了行政审批，推动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

截至5月底，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指挥下，32个新组建或重新组建部门和9个职能划转较多的部门，均制定了组织实施工作方案并报批；应集中办公的32个新组建或重新组建部门中，有31个实行了集中办公；应挂牌的25个新组建或重新组建部门中，有24个挂了牌……一系列与改革相关的举措紧锣密鼓、广泛落地，第一阶段工作目标基本完成。各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发出了推进改革的强烈信号，形成了气势如虹、势如破竹的改革良好局面。

驰而不息全面从严治党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聚焦新形势下管党治党的现实，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通过从严拧紧思想总开关、从严推动党风明显好转、从严加强纪律建设、从严把好选人用人关、从严监督管理党员干部、从严推动反腐败斗争、从严推动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党内风气明显好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考量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党的自身建设最突出的主题。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并对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八点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等。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从严治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示。”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期间，习近平提出了“四个全面”思想，将“从严治党”首次提升到了“全面从严”的高度，意蕴深邃，是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思想一次升华与飞跃。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重大战略？

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传统、党的性质、宗旨传承与历史使命完成的需要。早在1859年5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信中就提到：“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中国共产党是以严而著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明确提出严格管党治党的要求，并把它作为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核心理念。之所以如此强调“从严治党”，说到底就是由其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唯一宗旨；同时又担负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党必须具有一支政治合格的党员干部队伍，具有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以及严明的党规党纪、严格的党内生活，否则不可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而要做到这些，则有赖于全面从严治党，有赖于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与战斗力。

二是基于确保伟大斗争胜利及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2015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这里说的“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指的是要以敢于斗争的革命胆略和善于斗争的科学方略，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和干扰，化解面临的各种危机和风险，确保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顺利实现。这场伟大斗争的艰巨程度世所罕见，由此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的严峻考验也世所罕见。能否取得伟大斗争的胜利，关键在于从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不仅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而且还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越加复杂，提出的新课题新难题也不断增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党的领导弱化、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只有党的建

设在各个方面确实严格起来，才能解决党自身面临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才能经受起各种风险与考验，确保伟大斗争的最终胜利。

三是基于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设计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然，在这个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为其他三个“全面”提供坚强的领导力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正确的方向。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才能充分发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才能真正成为改革的方向引领者、顶层设计者和组织推动者，始终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上把握改革全局，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攻坚克难，实现改革目标；才能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依规管党的关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各种矛盾问题，使全面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具有牵引作用，与其他三个“全面”共同构成治国理政新方略。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起草情况作说明时提出，专门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整体战略，“四个全面”缺一不可，否则治国理政方略就无法有效实施。

总之，全面从严治党是党中央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总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命题，对于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二、稳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从严治党不能只当口号喊，必须体现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一切工作和活动中。按照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上至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有效措施，从严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及制度建设等，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上至下逐步深入推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思想建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又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针对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充分用好思想建党这个传家宝，扭住思想政治工作这个生命线，坚持不懈地做好思想理论工作，全面从严拧紧思想“总开关”。

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武装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这是新一届党中央执政理念、治国方略、工作思路和信念意志的集中反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当代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为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全党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把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摆在重中之重。中共中央连续举办多期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各级党委（党组）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对党员干部进行轮训。在党员干部学习培训中，各级党组织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帮助党员干部掌握讲话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引导他们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补充共产党人精神之“钙”。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针对理想信念存在的问题，中央和地方干部培训院校第一次专门把理想信念教育列入教学重要内容，作为干部参加学习培训的必修课；注重用好红色教育资源，采取现场教学、行为体验、研讨交流等多种方式，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感染力；发挥正反典型的教育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编印了《风范——老一辈革命家“三严三实”事例选》《优秀领导干部先进事迹选编》《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录》等学习材料，引导党员干部以先辈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以反面典型为鉴，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

强化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构筑党员思想堤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加强学习宣传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形成尊崇党章、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全国各级党组织把学习党章作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的首要任务，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党章意识；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和遵守中央提出的“五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等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契机，重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起到了教育改造提高党员干部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修养。

延伸阅读 4-9:

严明的纪律是胜利走完新长征路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长征取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重视纪律建设密不可分。毛泽东曾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什么是自觉的纪律？

在长征途中，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瓢一碗，实在买不到粮食，摘梨子时也要求写明数量，按价把应交的钱捆在树枝上；红军到达贵州茅台镇，无论首长还是战士去买酒，都按时价给钱，没有一丝一毫特殊……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小故事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以铁的纪律从严治党的自觉和决心。在红军时代就形成并不断完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更以命令形式固定下来。人民军队铁的纪律条款款定在实处，落在老百姓的心坎上。“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红军依靠严明的纪律形成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走过了万水千山。

习近平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长征锤炼出的精神，启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长征路上，要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中，努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治本之举。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中央聚焦于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颁布实施八项规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精神狠抓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推动党风出现明显好转。

从“八项规定”入手改进作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作风建设的突出特点。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就制定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是新一届党中央加强作风建设的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后，党中央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全党上下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八项规定精神广泛深入人心，成为新形势下作风建设的代名词。截至2017年8月，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万起，处理24.4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8836人。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一些曾经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刹住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得到攻克，干部的作风面貌焕然一新。

聚焦党内存在的“四风”问题，祛除党内多年积弊。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全党开展了一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以往历次活动不同的是，这次活动把“为民、务实、清廉”作为主题，把反对“四风”作为焦点，把“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作为总的要求，对党内多年来存在的思想之尘、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了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据统计，教育实践活动中，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压缩会议24.6%、文件26.7%、评比达标表彰活动31.2%；清退超标超配公车11.4万辆；调整多占办公用房2227.6万平方米；压缩“三公”经费27.5%，达530.2亿元；查处公款送礼、公款吃喝3083起。同时，活动中还清理违规会所512家、排查奢华浪费建设项目212个，清理清退“吃空饷”16.3万人，查处参赌涉赌党员干部7162人，清退参加“天价培训”的领导干部2982人，清理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兼职6.3万人。在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积极影响下，社会上请客送礼、拉关系、找门路的现象正在减少，盲目攀比、挥霍浪费、大操大办等行为明显改观，规矩意识、节俭观念向社会生活渗透。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件长期的任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后，为巩固这次党内教育活动的成效，中共中央决定从2015年4月起，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目的就是一鼓作气地把作风建设抓下去，不断巩固拓展作风建

设的成果，培育领导干部“严”与“实”的扎实作风。从总体情况来看，这次专题教育针对性比较强，算得上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与党性上的又一次集中“补钙”和“加油”，进一步推动强化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模范与标杆作用。

能不能把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选出来、培养好、用起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为全面从严把好选人用人关提供理论指导，有效推动了干部工作健康发展。

破解“四唯”问题，确立干部选拔新标准。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二十字好干部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是新时期党选人用人工作的基本遵循。为落实这些新标准，党中央重新修订了《干部任用条例》，把好干部标准贯彻体现到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基本条件、基本要求等各个方面。要真正使这些新标准贯彻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必须破除以往存在的“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旧标准。在破除“四唯”旧标准问题上，党中央想了很多实际管用的办法，效果也比较显著。以解决唯票问题为例，党中央强调要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特别是加强对“动议”环节的把关，对考察对象人选的把关；改进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制度，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了解真实民意，科学分析得票情况，把得票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而不是唯一依据。

严防“带病提拔”现象，严厉查处违规任用干部行为。所谓“带病提拔”，就是边腐边升、边升边腐。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譬如有的是“两面人”，不易察觉；有的发案有一定潜伏期，尚未暴露；但确实有我们了解不够、考察不深的问题。为防止这种现象的产生，各级党组织强化任前审查核实，实行干部档案“凡提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核”、

纪检监察机关的意见“凡提必听”、反映考察对象有关问题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对有疑点没有消除、问题没有搞清的人选，不得提拔或重用；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程监督，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和责任倒查制度，探索实名推荐干部办法，凡是出现“带病提拔”问题的，都要对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查，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严厉查处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铲除产生“带病提拔”的潜规则，对用人上的违规违纪行为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一经发现，严肃查处，绝不姑息。仅2015年，中央组织部共立项督办违规用人问题372件，查实123件，纠正违规任用干部305人，处理责任人员240人。

严格实施干部能上能下用人选人机制，逐步破除“官本位”观念。长期以来，干部能上不能下是制约干部工作的一个大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为此，相关部门制定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对解决干部“下”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方案。其中，集中规范了干部“下”的六种渠道，特别是把问责处理、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作为“下”的重要渠道，打破了过去那种年龄到点才下、违纪违法才下的状况。需要说明的是，《规定》中的“下”也包含着“调”和“转”，比如，对因工作能力、工作状态、身体状况等不适宜担任现任领导职务的，可以改任其他职务；对缺乏相关专长、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可以调整到有利于发挥其优势的岗位，等等。应该说，这个《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干部能上能下用人选人机制的建立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做到干部随从严管理成长、从严管理伴干部一生。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从严治吏精神，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制定完善了一套从严监督管理干部的办法，全面从严监督

管理党员干部。

从严日常监督管理，是从严监督管理党员干部的关键。从严治党的重点，在于从严管理干部，日常管理采取常规措施，关键时刻采取关键措施，多做规范言行、防微杜渐、纠偏纠错的工作，多做扯扯袖子、提提领子的工作，最大限度避免干部犯错误、犯重复性错误、犯大错误。近年来，中央组织部对多名中管干部进行了函询或约谈，并督促有关地方和单位对有举报反映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函询或约谈。各地各部门把谈心谈话作为严格管理干部的常态化工作，对有问题反映的、工作不在状态的重点谈、及时谈，加强引导、指出问题、提醒帮助。完善日常管理机制，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组织管理和个人自律结合起来，加强对干部队伍状态的分析研判，综合运用平时考核和纪检监察、巡视、审计、信访举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核查等成果，使干部时刻感到管理就在身边、管理无处不在。

针对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是从严监督管理党员干部必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积极回应群众反映和关切的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2014年1月，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和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关于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的通知》，明确了对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的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纪律要求。仅用一年时间，全国超配的4万多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已整改消化2.5万多名，完成62.7%；2012年11月至2016年1月，用3年多时间，集中清理“裸官”，全国共清理副处级以上“裸官”3961人，对不符合要求的1061人进行了岗位调整；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有1790名拟提拔为处级以上干部考察对象，因抽查核实发现问题被取消提拔资格。清理整顿领导干部社会化培训，对参加高收费培训的3094名干部督促退学，23个高收费项目停办；开展干部档案专项审核，截至2015年10月，省管干部档案审核基本完成，对273名档案存在问题的干部作了处理。之后市县两级和

中央单位专项审核工作也得以有序推进。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案例，在领导干部群体中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专门对换届纪律问题进行专项查核，先后查出南充贿选案、衡阳破坏选举案、辽宁拉票贿选案。其中，仅辽宁拉票贿选案就有 955 人受到查处，包括中管干部 34 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人数最多、性质最恶劣、情节最严重的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

完善管理制度，是从严监督管理党员干部的根本之策。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从完善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入手，更加注重把日常管理、重点管理和关键时刻管理贯通起来，把科学定责、加强考核、强化监督等链接起来，先后制定实施了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监督工作等一系列制度规范。这些规范文件从细节上做到了对管理监督对象全覆盖、管理监督过程全覆盖，形成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的管理监督系统，使干部监督管理制度扎得更加紧密。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十八届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不断扩大组织覆盖面、建强骨干队伍、强化基础保障，全面从严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求，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按照党中央全面从严管理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围绕突出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广泛开展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创建活动，推动基层党组织更好地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至 2015 年 10 月，为加强县乡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络建设，各地先后选派 300 多万名干部到基层挂职任职、担任第一书记，选派 970 多万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众服务，新建、扩建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 5.8 万个；加大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力度，全国共排查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5.8 万个，整顿转化 94%；排查软弱涣散社区党组

织 5200 多个，整顿转化 95%。这些强有力的举措，有效扭转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局面，提升了其服务改革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能力。

严格党员教育管理以提升质量。为切实提升发展党员的质量，党中央对党员队伍总体规模进行了宏观调控，适当控制了党员数量增长过快的势头。截至 2017 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8956.4 万名，比 2016 年净增 11.7 万名，增幅为 0.1%。党的基层组织 457.2 万个，比 2016 年增加 5.3 万个，增幅为 1.2%。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党员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部署要求得到贯彻落实。伴随数量增幅的降低，党员队伍结构得以优化，高知识群体党员占比增幅明显加大，生产工作一线党员占比明显回升。为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对不合格党员进行了稳妥处置，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各地共认定不合格党员 24.7 万多名。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党中央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制定实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五年规划，综合运用远程教育、共产党员网和微信、易信等信息化平台，不断扩大党员教育覆盖面，增强针对性和及时性。

健全和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为推动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自上而下开展了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总体上来看，建立述职评议考核制度，使基层党建由“软任务”变成了“硬指标”，使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增强了责任意识。许多参加述职的书记表示，述职评议考核让自己明确了主责、回归了主业，增强了谋党建、抓党建的主角意识。

腐败与党的宗旨是不相容的，反对腐败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十八届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住了腐败蔓延势头。

从严查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

起打”，不管是谁、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共查处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0人，中央纪委委员8人。截至2017年8月底，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339人，追回赃款93.6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40余人。同时，对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苏荣等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对山西省、中石油等地方和单位多年积累的严重腐败问题进行严肃处理。查处这些大案要案，彰显了党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

利用巡视这把反腐“利剑”，充分发挥其威慑作用。从中央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巡视机制和开展巡视工作，是党内监督的制度性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高度重视和加强巡视工作，专门制定了中央巡视工作五年规划，确定中央巡视工作方针，修订颁布《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五年中，十八届党中央共进行了十二轮巡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每一轮巡视情况汇报，并对巡视工作进行专门研究。这不仅说明党中央对巡视工作十分重视，而且对于巡视工作的有效开展也具有推动作用。从五年的实践来看，巡视确实已经起到了震慑、遏制和治本作用，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把“利剑”，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多措并举，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从这几年党中央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来看，很多腐败现象之所以滋长蔓延，甚至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与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纪委（纪检组）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党中央特别强调从强化“两个责任”入手，即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并对失责行为

进行严肃问责。同时，党中央着手推动纪检体制改革，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推进纪检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实施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充分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加大追责问责的力度，并将处理的结果向全党公布，以儆效尤。

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最可靠、最有效、最持久的治党方式。邓小平曾讲过，制度性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十八届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手抓制度执行，全面从严推动制度治党、依规管党。

加快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步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党内法规建设的目标——到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完成这个目标，党中央先后修订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制定出台党内法规备案和解释两个规定，编制实施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党内法规清理。根据全面从严治党需要，中央制定出台50余部重要的党内法规。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在推动制度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把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有机衔接起来，确保把党纪党规挺在前头，确保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确保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在统一。

高度重视制度的执行力，推动制度治党与依规管党。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格执纪。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再好的制度不执行、形同虚设，就一定会形成“破窗效应”。因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党中央反复要求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一手抓制定完善，一手抓贯彻执行。党中央明确要求，改革举措由谁主持制定，就由谁督促落实；涉及哪一级、哪个部门的业务，就以谁为主

落实，其他部门和单位要协同落实。为了推动改革举措的落实，中央改革办专门成立了督察局，对重点改革文件执行情况进行督察；把党内法规执行纳入党委督察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党内法规执行检查常态化机制，确保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通过上述举措和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明显成效。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逐年走高，2013年至2018年，反腐满意度由75%增至93.9%。五年内提高18.9个百分点。许多干部群众说，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真反腐败才能兴党兴国，现在中央是腐败分子的克星、人民群众的福星，党和国家更加充满希望。由此可见一斑，党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不仅极大地提振了全党的信心，而且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三、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深沉的使命忧患感，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同时，应清醒意识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党始终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解决党自身存在的沉疴顽疾仅仅开了个头，反腐败压倒性态势虽已形成，但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宗旨“总开关”尚未拧紧，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状况没有彻底扭转，政治生态“污染源”还未根除，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正因为此，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动员令，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在通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进道路上，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and 党的建设这个根本，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政治建设始终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听党指挥、为党尽责。

坚定理想信念宗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宗旨是指引共产党人前进的火炬和灯塔。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把好思想“总开关”，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要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定“四个自信”，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党的领导很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选对人、用好人上。党管干部，就是要坚持好干部标准，坚持党委选拔任用、教育培训、培养锻炼、监督管理干部。“管”要体现在日

常，掌握干部思想工作生活状况，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扯扯袖子、批评教育，校正干部成长的方向。要改进干部考察考核工作，掌握干部的日常表现，看组织交给每项工作的完成质量、遇到急难险重任务能否顶得上去，不能等到选任干部时考察一次，也不能到年终考核一回。要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基础上，创新党组织活动方式，让党员干部在政治生活大熔炉中经受锤炼。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党性决定党风。作风建设必须牢牢抓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根本。人民是我们党生存发展的土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只要牢记根本宗旨，永远保持拳拳赤子之心，人民就会始终选择我们、认同我们、拥护我们。要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更好地懂得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打赢作风建设持久战，决不能让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卷土重来。要以更大力度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督促党员干部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不浮躁、不浮夸，追求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以艰苦奋斗、崇尚实干的工作作风，以勤俭节约、崇尚清廉的家风，带动民风社风向善向上。

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党章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相应纪律处分权限。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既是党内监督的对象，也是管党治党的主力，不能当老好人，要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拿起党的纪律武器，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要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在新的形势下实践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治“病树”、正“歪树”、拔“烂树”，维护好“森林”。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开展经常性、针对性、主动性的纪律教育，使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让党员干部知敬畏、

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反腐败斗争严峻复杂的形势没有变，党中央巩固压倒性态势、赢得压倒性胜利的決心坚如磐石。一个时期以来，领导干部被“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问题突出，有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为了个人仕途升迁搞利益输送；有的民营企业主在掌握经济权力后，谋求政治上的权力，“围猎”腐蚀党员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形成利益集团。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重点查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案件，不收敛不收手、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严厉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款物伸手的决不手软。推进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堵死腐败分子外逃之路。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一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抓紧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制定国家监察法，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深化标本兼治，强化不敢腐的威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党兴则国兴，党强则国强。只有坚持人民立场，以顽强的斗争精神，解决好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之无愧的坚强领导核心。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推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充分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既饱受战火，又获得惊人的发展和巨大的进步，世界一体化趋势不可抵挡。免于战争、缔造和平，扩大合作、共同发展，已成为全人类最迫切的愿望。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至今远远没有完成，局部的地缘战争及潜在的危险依然存在，有不少人仍然处于饥饿与贫困之中。顺应人民的呼声，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弛而不息的前行，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使命，也是对执政者智慧的考验。

21世纪及未来更长时间，人类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实力均势的世界，是强权政治、集团对抗的世界，还是划分势力范围的世界？中国开出的方案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后30多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回答人们广泛关心的问题，奏

响了时代最强音，在国际舞台上引起强烈反响。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大家园里，各自利益交融、安危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还号召人们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此后，他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怎样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这就是“五位一体”的大布局：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安全上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文化上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生态上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标志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形成，为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了蓝图。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客观趋势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逐步深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涵与外延都得到极大丰富，许多新的理念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和接受。

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许多新的理念，也可以把它概括为五观：

双赢、多赢、共赢的利益观。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要相互补台、好戏连台。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

开放、合作、共赢、融合、创新的发展观。中国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

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致力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加强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合作共赢，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

正确的义利观。树立正确义利观，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那些对中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开展合作时要注意多予少取，早予晚取，绝不搞损人利己，以邻为壑。正确义利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政治方向和道义支撑，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正确义利观提供广阔天地和切实保障。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观。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现如今，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在倡导和树立外交新理念新观点的同时，中国还致力于打造互利共赢、包容共进的发展和利益共同体。中国认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

益共同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积极贡献者和南南合作的大力促进者，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履行国际承诺，把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深化各层面发展伙伴关系，携手寻求共同发展，打造发展和利益共同体。中国主张各国应摒弃零和博弈的陈旧安全观念，坚持以互利共赢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看待和处理国际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的基础上。中国坚决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反对转嫁负担、祸水外引，更反对为一己私利搞乱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同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同各国增进互信、弥合分歧、深化合作，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共护的安全新路。显然，中国以合作共赢提升了国际安全观，使其更具时代先进性和现实针对性，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不仅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中国主张权责共担，坚持同舟共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随着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国际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把对外援助作为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体现；强调加强合作，共护和平发展大环境，打造责任共同体，推动安全对话与磋商，加强灾害管理、海上搜救、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积极探讨建立亚洲区域安全合作框架。

总而言之，当前国际形势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信息化趋势，无论人们身处何处、信仰何如、是否愿意，世界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建立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构建国际安全格局，维护人类发展美好前景，加强人类文明交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最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

延伸阅读 4-10: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精彩演讲节选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各国平等参与决策，构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日内瓦见证了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最后宣言的通过，见证了冷战期间两大对峙阵营国家领导人首次和解会议，见证了伊朗核、叙利亚等热点问题对话和谈判。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启迪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只要怀有真诚愿望，秉持足

够善意，展现政治智慧，再大的冲突都能化解，再厚的坚冰都能打破。

“法者，治之端也”。在日内瓦，各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就政治安全、贸易发展、社会人权、科技卫生、劳工产权、文化体育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义，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筑就了日内瓦多边外交大舞台。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我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

——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从公元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延续40余年的冷战，教训惨痛而深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的先辈建立了联合国，为世界赢得70余年相对和平。我们要完善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

瑞士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说：“不应为战争和毁灭效劳，而应为和平与谅解服务。”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只要坚持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

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发动战争，不能破坏国际法治，不能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核武器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全面禁止并最终彻底销毁，实现无核世界。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近年来，在欧洲、北非、中东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再次表明，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反恐是各国共同义务，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加强协调，建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为各国人民撑起安全伞。当前，难民数量已经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纪录。危机需要应对，根源值得深思。如果不是有家难归，谁会颠沛流离？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等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动员全球力量有效应对。中国决定提供2亿元人民币新的人道援助，用于帮助叙利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问题都同地缘冲突密切相关，化解冲突是根本之策。当事各方要通过协商谈判，其他各方应该积极劝和促谈，尊重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等疫情不断给国际卫生安全敲响警钟。世界卫生组织要发挥引领作用，加强疫情监测、信息沟通、经验交流、技术分享。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卫生事业的支持和援助。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兼顾当前和长远，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要抓

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本世纪初以来，在联合国主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口用上互联网等，还将在2030年实现零贫困。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并设法解决，但不能因噎废食。

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历史学家早就断言，经济快速发展使社会变革成为必需，经济发展易获支持，而社会变革常遭抵制。我们不能因此踟蹰不前，而要砥砺前行。我们也要从现实中寻找答案。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

去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聚焦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问题，通过《创新增长蓝图》，首次将发展问题纳入全球宏观政策框架，并制定了行动计划。

——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我们要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平衡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我们不能让这一成果付诸东流。各方要共同推动协定实施。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

中国古人说：“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资料来源：人民网，2018年01月19日。

二、倡议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2013年的金色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第一次向世人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时隔一月之久，习近

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倡议，唤起了沿线各国人民悠久的历史记忆。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古代丝绸之路主要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中，陆上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以都城洛阳为起点，经凉州、酒泉、瓜州、敦煌、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明代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极盛时期。纵观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看出，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

在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丝绸之路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一种文化和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向世界重提“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中国的发展同沿线各国的发展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

全新的时代内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受到沿路各国的普遍欢迎和积极参与，各项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形成广泛国际合作共识。联合国大会、安理会、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有关决议或文件都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互联互通网络逐步成型，贸易投资大幅增长，重要项目合作稳步实施，取得一批重要早期收获。亚投行、丝路基金的成立为金融合作提供了坚实支撑。中欧班列驰骋在广袤的亚欧大陆，运载的是琳琅满目的货物，联通的是亚欧国家的市场需求，架起的是沿线国家人民的友谊桥梁，成为“一带一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成果正在惠及世界，为增进各国民众福祉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同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2017年5月，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次论坛共有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吸引了全球4000余名记者前来报道。这足以说明此次论坛的重要性。

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是这次高峰论坛的主题。与会各方代表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即“五通”为主线，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支撑、人文交流、生态环保和海洋合作等重要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讨论。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发言时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均长期开展重要行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当地的安全与人道局势动态有着深入的理解，并对当地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具有直观的认识。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

通过加强与中国有关部门及中国红十字会的坚实合作伙伴关系，在该框架内实现长期合作，为此次论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作出重要贡献。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保尔森在论坛上表示：美国有全世界一流的企业、出色的财务操作、顶尖的环保技术，能在很多方面作出贡献。所以，希望美国公司能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中保持开放心态，寻求参与的机会。

尽管这次高峰论坛时间短，但是成果丰硕。仅论坛期间就形成了76大项、270多项有代表性的成果，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国家及国际组织总数达到68个，中国还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同时，中国政府表示，未来三年里将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其中，600亿元主要包括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可根据民生发展的核心关切问题，与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和经济商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确定优先发展合作重点和具体项目需求。而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的10亿美元则定向用于在沿线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减贫、农业、教育、卫生、环保、工业发展、贸易促进等领域的发展合作项目。由此可见，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不仅为实现沿路各国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而且确实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于各国人民。

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为标志，“一带一路”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

总之，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其理念是共同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也就是说，它不是中国一家分蛋糕或拿蛋糕的大头，而是沿线各国共同把蛋糕做大，一起分蛋糕。在这一过程中，既要通过加强各方合作为国际社会作贡献，也要通过扩大对外合作，助推中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促进中国国内改革和发展。

三、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成立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总部设在北京。截至2017年5月，亚投行正式成员国达77个。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成立亚投行呢？亚投行成立经历了哪些关键性过程？它对于中国有哪些重大意义？

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来看，亚投行的建立最主要的背景就是新兴大国的异军突起。近二十年来，世界新兴国家日益成为经济新秀，而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尤其是最近十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低迷，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率先摆脱危机影响，不仅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引擎，而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随着力量的此消彼长，为更好地发挥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改革原有的国际金融制度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设立亚投行，就是推动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

从区域层面来看，亚洲基础设施落后是亚投行设立的最直接的原因。亚洲经济占世界总量的1/3，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拥有全球六成人口。但因建设资金有限，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信等基础建设严重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各国要想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需投资8000亿美元。其中，68%用于新增基础设施的投资，32%是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所需资金。现有的多边机构并不能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也仅有2230亿美元，两家银行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大概只有区区200亿美元，无法满足基本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设立亚投行，可以说是正逢其时，能够较好地

解决庞大的资金需求。

从中国本身而言，设立亚投行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亚洲各国经济的融合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对外投资 2012 年同比增长 17.6%，创下了 878 亿美元的新高。而且，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方面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在公路、桥梁、隧道、铁路等方面的工程建造能力在世界上也已经是首屈一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产业期望更快地走向国际。但亚洲经济体之间难以利用各自所具备的高额资本存量优势，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缺乏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亚投行的设立，为亚洲多边合作提供了平台。

正是基于上述战略考量，2013 年 10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同域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习近平主席关于设立亚投行的倡议，得到亚洲很多国家的响应。2014 年 10 月 24 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 21 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标志着这一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将进入新阶段。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 500 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 50%，为最大股东。各意向创始成员同意将以 GDP 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

自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经过多方八轮谈判，最终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截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包括缅甸、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中国等在内的 17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股份总和占比 50.1%）已批准《协定》并提交批准书，从而达到《协定》

规定的生效条件，即至少有 10 个签署方批准且签署方初始认缴股本总额不少于总认缴股本的 50%。这标志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2016 年 1 月 16 日，亚投行开业仪式在中国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金立群当选亚投行首任行长。这意味着在历经 800 多天的筹备筹建后，全球迎来了首个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运营。

毫无疑问，亚投行的设立是一项利己利人的战略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它一方面能够解决中国资本过剩的问题，让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发挥投资效益，为中国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强有力的资本支持，并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上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能够帮助提升本地区应对未来金融危机和其他外部冲击的能力，加快推动亚洲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从而为推进亚洲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四、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保护国家（公民）海外利益，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尤其是一些传统大国强国更是如此。早在中世纪以前，欧洲一些列强打着“保护海外公民利益”旗号，直接海外用兵的事例层出不穷，并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殖民狂潮的掀起而滥觞。19 世纪中叶以来的历次外国侵华，几乎都或多或少打着“保护海外公民利益”的旗号，实际上都是对华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

进入 20 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联合国的诞生和国际公法的健全，欧美传统上用于保护海外公民利益的“炮舰政策”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压力、外交交涉、经济手段和领事保护等。但是，当外交、法律、经济等手段都不足以维护或实现海外经济利益时，军事手段仍然是一些大国常用的手段。“9·11”事件之后，美国为了让中亚国家支持其反恐，

给中亚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如 2002 年，美国国防部制定了 2004 年至 2009 年对吉尔吉斯斯坦 15 亿美元的军援计划，以帮助扩建玛纳斯空军机场。2006 年日本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几艘数十吨级的海上巡逻艇，以帮助印尼追捕海盗。2012 年以来，日本向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提供了数艘巡逻船。2014 年 10 月日本新修改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将“援助军队在灾害救援等非战斗领域的活动”纳入援助范围。由此可见，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是一个综合体系，包含外交、法律、经济、军事等多方面。

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相对于欧美一些国家，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意识要薄弱一些。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海外交往日益增多，海外经济利益正在快速拓展，保护海外利益问题已然提上国家重要议程。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海外资产与人员频频遭遇恐怖袭击、排华事件等重大风险，保护国家海外利益和人员安全显得格外迫切。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情况来看，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风险大致有四类：一是战争、地区冲突与社会动乱，比如利比亚冲突、也门内战就曾严重威胁了所在国家与地区的中国企业与人员的安全，尽管中国政府尽最大可能成功保障了人员安全，但中方企业仍然遭到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二是所在国家政局动荡与政策变化，比如委内瑞拉政局动荡对中资铁路项目造成的不利影响，津巴布韦政府 2016 年对部分中资公司进行的国有化，这都直接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生产和海外利益。三是社会治安犯罪与排华骚乱问题，比如阿根廷、巴西、非洲、中东乃至东南亚等国家频频发生的对中国商人敲诈勒索甚至抢劫、绑票的犯罪行为，以及在哥伦比亚、西班牙等国多次发生的，对中国商铺的哄抢行为。四是恐怖主义、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比如 2016 年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对于中资公司的袭击，发生在马里的对中国维和部队营地的袭击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恶性疾病，都对中国的海外利益构成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的海外所遇到各种风险，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没有的，它的出现具

有很强的时代色彩，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无法避免的新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及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紧密。一方面，大量人员、企业的走出去，让中国人在世界的影响力空前增加，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国门之外越来越多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从以前主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向面向所有国家的全方位开放转变。一些以前在经贸人员往来上联系较少的不发达、不稳定、安全风险较高的国家，正在与中国变得关系紧密，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南苏丹一些安全风险较高的国家正在成为中国的投资重点。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人员在富贵险中求的同时面临更大的风险。

当前全球政治与经济新秩序正处于重构的过程当中，不安全、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多，全球安全风险正处于上升期。一方面，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西方中心的世界安全体系正在逐步瓦解。一些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权力真空，各种极端势力正在利用这种真空，快速发展壮大自身。最典型的就是肆虐于中东，并造成欧洲、中亚、东南亚、非洲地区重大安全风险的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政治衰朽迹象明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不安、法律秩序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其社会安全风险快速上升。近年来，阿拉伯诸国、乌克兰、南美等国家的国家政局危机，无不带来了重大社会风险。这无疑给正在走出去的中国带来巨大风险。

伴随中国国力的增强，出国人员和企业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而中国的海外安保力量则相对滞后，这就导致了大量企业与人员的安全状况存在较大的隐患。一方面，中国海外企业与人员的安保意识还相当淡薄，这直接导致了大量公司企业与海外人员的安保力度不足以应付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安保行业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国际化程度

仍然较低，难以有效承担复杂情况下的海外安保。

在海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提高海外利益保护能力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中越来越迫切的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显然，中国不可能与西方国家一样，采取“武力”和“霸道”的方式来维护国家海外利益，这与中国外交理念不相符合，也是中国一直反对的做法。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主要还是依靠政府间合作、安保市场购买服务与华人华侨社区合作自保这三个方面来实现，当然极端状况下也不排除适当的军事介入。

2015年也门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已严重威胁到当地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为保护中国在也门的人员和财产不受威胁，中国政府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命令，决定派遣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也门执行撤离中国公民任务。2015年3月，中国海军舰队暂停亚丁湾护航任务，参与撤离在该地区中国公民的海外救援行动。这是中国首次动用军舰撤侨。在救援过程中，中国军舰冒着也门冲突方炮火的威胁坚决执行政府命令，靠港近距离执行任务，并仅用39分钟完成撤离任务。此次行动，中国政府不但将613名中国公民全部撤离也门，同时中国海军临沂舰还乘载巴基斯坦等10个国家在也门的225名侨民，自也门亚丁港平安驶抵吉布提。中国政府在此次行动中不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的大国实力，也体现中国政府积极倡导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称赞。正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斯尼姆·阿斯拉姆所描述的那样：中国政府在帮助撤离巴基斯坦公民中的表现堪称合作典范。

仅2015年全年，在全球许多地方发生的涉及中国海外公民安全的国际事件，除了也门内战外，还有尼泊尔地震、波士顿爆炸案、韩亚空难、巴黎恐怖袭击等突发案件。据统计，在这一年里，中国在海外处理的涉及中国公民安全案件近6万起。中国政府在面临各种突发事件上，能够快速反

应、积极应对和妥善部署，极大程度上维护了海外公民的权益，充分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政府应有的责任和及时有效保护海外公民利益的能力，赢得了境内外中国公民多方面的赞赏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肯定。

中国政府保护海外公民的积极举措，一方面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另一方面表明中国正在建立与自己海外利益相匹配的保护体系，这对于推进国家对外交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全球治理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提出来的，旨在解释世界多极化趋势下如何加强对全球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问题。换一句话说，全球治理就是在没有一个全球政府的前提下，必须通过各国之间开展制度化合作加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国际经济、跨国犯罪，等等。这些问题，单凭一国或某一个国际组织的行动都无法解决，更不能用战争与冲突的方式加以解决，只有通过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商、谈判与合作。

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在战后美国“霸权模式”下建立起来的，其弊端极为明显，如治理领域严重失衡，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这些弊端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在实践中，全球治理言易行难，“雷声大、雨点小”，主要受到大国间的矛盾、“大多边”与“集团化”的矛盾以及发达国家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等多重问题的困扰。因而，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路径就是从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转变为由东西方共治的全球化治理

体系。

显然，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的。近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仅向世界贡献了治理理念，还以务实稳健的作风推动着全球治理更加健康、公平、有序地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伟大战略构想，也是积极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动作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体系；更不是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而是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过程中坚持聚同化异、扩大合作交集面和利益汇集点的基本精神。几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带去了新的机遇，而且以其“合作、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的精神推动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严守承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建设。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担当发展中国家责任的积极信号。随后，中国如期向联合国提交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并且明确了于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并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本国“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做出“铁腕”治理环境的国内外承诺。此外，中国还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推动各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和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尤其是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政府承诺将保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一贯立场，继续推动协定实施细则后续谈判及有效落实，这对坚定国际社会的

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制改革。近年来，中国一直努力加强与新兴经济体进行合作，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配额和投票权改革，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通过了增加发展中国家份额和投票权的改革方案。2015年1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终于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这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向前迈进一步。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改革的努力过程中，中国加强金砖国家内部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金砖银行平分股权的制度设计就是中国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以合作共赢理念完善现存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重要体现。为补充和完善既有国际金融体系，中国还倡议设立亚投行。从亚投行的酝酿到筹备，中国一直遵循公开、透明、高效的原则，努力构建一个真正体现合作共赢理念的多边开发机构。中国以不刻意追求“一票否决权”和吸取既有国际组织的经验教训和私营机构经验，构建21世纪先进治理理念的国际多边机构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国际信任。

加强以南南合作为基础的国际发展合作框架。贫困和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全球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致力于通过南南合作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国际发展道路，倡议各国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并提出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相关国家的无息贷款债务、创设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务实行动和方案。这是中国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公正、高效、包容、开放的全球治理体系最生动的例证。

中国积极参与并支持全球化，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战略。2016年，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坚持进一步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7%，位居世界

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城镇新增就业1314万人。中国在开放中进步，在发展中进一步开放。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而且随着发展会越来越开越大。中国政府承诺：大力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外商投资准入，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上市、发债，在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享受《中国制造2025》政策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2017年，世界形势并不乐观，特朗普政府高举反对全球化旗帜，英国脱欧的影响仍在深化，全球化未来将何去何从，世界将目光聚焦在中国。而中国坚定的支持全球化，坚定的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世界提供了一颗安心丸。“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浪潮不会被重峦叠嶂所阻，不会被暗流浅滩所滞”。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勇立潮头，担当起大国责任，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当然，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除了不断总结以往实践经验外，还必须不断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尤其是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同时，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这就必须加大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近年来，这些基础性工作已经有所起色，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作了充分的准备。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

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为构建公平公正高效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内容简介

本书按照历史的视角与脉络，从初心与使命的前提条件、制度基础、必由之路、接续奋斗等四个方面，在各个历史时段穿插一些生动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史论结合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人为初心和使命不断奋斗的伟大历程及取得的伟大成就，目的在于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为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同时，也希望本书为读者了解中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深刻洞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之间的逻辑关系提供帮助。



E政通



专家库



研究网



微信公众号



官网

ISBN 978-7-5171-2748-2



9 787517 127482 >

定价：46.00 元